

## 宏觀視野

- 1 百餘年來的英法漢學——反思性的粗淺回顧  
張廣達
- 5 從中美相關文獻理解人觀與我觀  
楊國樞

## 多元觀點

- 9 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成果評鑑措施  
彭森明
- 13 關於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評鑑指標的幾點看法  
黃俊傑
- 19 關於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的初步觀察  
石之瑜
- 21 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人的儒學反思意涵  
——由周定山的〈「儒」是什麼？〉一文談起  
金培懿
- 23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荀子心與道的關係片論  
林宏星
- 27 關於昭和初期「近代超克」論的一個考察  
——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  
陶德民
- 33 有關臺灣和日本的海洋性之空間心性與政策的地勢意義  
山室信一
- 37 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Thinking about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Ann Waltner

## 計畫近況

- 43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 45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 47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 49 東亞法治之形成及發展：對東亞法治理論、體制與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計畫
- 51 華人的主觀與我觀：跨學科及跨文化研究計畫
- 53 生產力與效率研究總計畫：從東亞邁向全球化研究計畫

## 院務新訊

- 55 新近出版品介紹
- 57 院務短波
- 59 院內大事紀

## 百餘年來的英法漢學 ——反思性的粗淺回顧<sup>+</sup>

張廣達<sup>\*</sup>



英法漢學的發展，接續了葡萄牙、意大利、荷蘭記錄東亞和中國的過程。十六世紀下半葉，歐陸各國的耶穌會士遠渡重洋，東來中國，時在中國的明代後期。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首先掌握漢語，而後努力探索與中國士大夫交往的門徑，進而將他的所見所聞和研究成果介紹給西方，利瑪竇可以被視為早期近代西方漢學的鼻祖。從他開始，直到清代前期，高階耶穌會士向羅馬教廷定期遞交工作報告，其他各級不同教階的耶穌會士也根據各自在華傳教的親身經歷，留下大批書簡、回憶錄和介紹與評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基層社會民俗等各個方面情況的著作。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歐洲以耶穌會士為主體觀察和介紹中國的階段。歐洲耶穌會士的中國

研究構成漢學史中的獨立篇章。誠然，其間也有俗界人士記錄中國的情況，如尼霍夫（Johannes Neeuhof, 1618-1672）於順治十三年（1656）作為荷蘭使團的成員到達北京並謁見順治皇帝，後在中國境內旅行二年多詳盡記錄所見所聞，但是這樣的著述在這一時期當屬特例。

英國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之後，為了打開大清帝國的門戶，一七九三年派出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5），一八一六年派出威廉·皮特·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年）率使團訪華。兩團的隨團副使或祕書和團員們留下大量關於中國的記載。隨着英、法兩國之加緊東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三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sup>\*</sup>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研究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

向擴張，英、法漢學繼葡、意、荷之後而加強重視漢學研究。英國有種種所謂「東印度公司漢學」(East India Company sinology)的運籌。一八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國的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設置漢學講座。一八二二年，法國成立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其宗旨是研究亞洲，推廣有關亞洲的知識。該會出版《亞洲學刊》(Journal Asiatique)，作為研究亞洲的權威雜誌，刊行至今，已有一百八十七年。兩年後，英國成立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RAS)，開辦講座，發行《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RAS，現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至今。

一八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此後中國與英、法等西方國家幾次發生戰爭。參與對華作戰的英、法等國軍官留下大批有關中國的著述。其後，來華使節、新教各派傳教士、旅行探察家等紛紛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英、法之外，德、俄、意、比利時、奧·匈、捷克、瑞典、丹麥、芬蘭等大國小國，都各自開始研究東方，或為研究東方打下基礎，逐步形成一定的東方學傳統。從沿革看，自十九世紀殖民擴張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區域研究的影響日益擴及歐洲以來，歐洲漢學的沿革是一個內容豐富和龐雜的課題。歐洲的大小國家分別使用二十餘種語言對中國做民族誌性質的描述和理論性探討。從橫向看，歐洲各國的漢學又相互影響，實為一個整體。在法國，近年來，每當舉辦紀念當年東方學和漢學前輩業績的討論會，如二〇〇三年十月八至十日紀念法國印度學家列維(Stanislas Lévi, 1863-1935)的國際討論會、二〇〇八年十月二至三日紀念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

的國際討論會，都少不了引發人們今昔對比，而一旦回憶當年的來龍去脈，也就不免對漢學各個領域的古典研究和現實研究的關係、培養專業人才的方向，相關經費的萎縮等都有所議論，並對未來發展前景有所思考。

在英國，Tim Barrett 教授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廿四至廿六日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一份報告，該報告於一九八九年重刊為一書，書名《異常的萎靡》(Singular Listlessness)。<sup>1</sup> 此書考察英國漢學的發展脈絡和強調今天英國漢學的委頓狀態，此書今天仍然經常被人們引用。特別是書名引人矚目。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法國國家研究中心(CNRS)的一批東方學家聯合舉辦了《爭取一個新的東方學政策研討會》(Colloque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de l'orientalisme)，會後由法國亞洲學會結集四十七篇發言和相關文章命名為《東方學的白皮書》分兩冊出版，具體書名分別作《一份論東方學的白皮書的導論》<sup>2</sup>和《法國東方學白皮書》。<sup>3</sup> 此書對法國東方學的各個領域的現狀和前景，都由各該領域的研究者做了論述。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至廿二日，蔣經國基金會在臺北召開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十三個國家四十五位海外與六十餘位臺灣的研究中國的耆宿和重要學者、四十餘位研究生與會。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集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 Sinology* 之重要意義無需再作強調。

一九九三年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當代中國研究討論會，會上文章滙輯出版，其中有四篇文章論述英、法、北歐、俄國的漢學研究情況，刊於日本出版的 *Asian Research Trends: A Humanities*

1 *Singular Listlessness* (London: Wellsweep, 1989).

2 *Prolégomènes à un Livre Blanc sur l'orientalisme*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1993), 62pp.

3 *Livre Blanc de l'orientalisme français*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1993), 291pp.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 (1994)。該刊由位於日本東京的東亞文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合作出版, 凡出十三期 (1991-2003)。

百餘年來, 英法的漢學的發展反映着時代特徵。從反思角度考察, 英國的漢學也許存在種種有待商榷的問題, 如政府的補助款額減少、一度過分依賴聘請歐陸德、荷等國漢學家、忽視培養本土優秀人才和專家、不像哈佛燕京學社那樣善於積累和運用文獻資料、研究中國過於注意配合經貿、開拓市場的功利價值等。但是, 二戰之後, 後來出任首相的艾登 (Anthony Eden) 早在一九四五年後任外務大臣期間, 作為英國唯一的一位東方學外務大臣, 幕后推動 Earl of Scarborough 主持的多個部會聯合委員會, 一九四六年頒佈 Scarborough Report, 有力地推動戰後英國的東方學和漢學發展。繼之, 一九六一年有 Hayter Report, 一九九九年有 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Report。百年來英國的漢學研究的成就是顯著的。李約瑟 (Noel Joseph T. M. Needham) 的《中國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與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合編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希德主編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是其明證。又如, 魯惟一 (Michael Loewe) 之研究漢代和木簡, 蒲立本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之研究唐代、中國史學史、中國中古音韻, 都是突出的貢獻。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召

開的會議, 也是檢討東方學和漢學發展中經費減少、機構裁撤等大同小異問題。

在介紹英、法兩國漢學成就與貢獻之同時, 不妨注意兩國漢學各有特色。無論出身和經歷如何, 法國漢學家從事經典研究時, 從來不忽視中國的現實狀況。這種學風, 從高弟 (或譯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列維、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等都是如此。法國的漢學的另一特色是, 漢學家經常與東方學中其他部門的專家合作, 迺至於與社會學家合作。列維、沙畹、伯希和在中、印課題上的合作是其顯例。沙畹之強調社會學對研究中國的意義, 由於馮承鈞先生繙譯的多是沙畹的考據性論文而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實際上, 法國的漢學集體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就與印度學、伊朗學、突厥學、蒙古學、藏學關係密切。其後, 伯希和、馬伯樂 (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主導法國漢學學壇時期, 到二戰以後的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及其弟子們的時代, 都不乏多科協作的案例。再者, 法國漢學高度重視中國的中外目錄學和書誌學。他們在文字字形學和訓詁學上雖然略遜於中國學者, 但在歷史音韻學的審音勘同方面, 因為善於運用同一種文獻的的多種語言版本勘同和多種不同語言文字的審音勘同, 有力地突破了漢語及其方言的音障。例如, 沙畹與伯希和的合作研究中國的宗教, 在合譯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摩尼教殘卷的過程中也邀請伊朗語言學家高狄奧 (Robert Gauthiot) 參與考釋漢譯的伊朗語詞彙, 其成果至今為學界所依據。<sup>§</sup>

§ 筆者於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中的發言, 曾簡單介紹最近幾年瑞士的畢來德 (Jean-François Billeter) 教授與法國的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ien) 教授兩位的學術爭論; 這部份筆者擬另文介紹其大略。另外, 筆者計畫將於下學期的授課中, 盡可能具體地、詳細地介紹英、法和歐洲某些國家的漢學情況。



## 從中美相關文獻理解人觀與我觀

楊國樞\*

### 人觀與我觀的含義

人觀是指民眾對人的看法、觀念或概念，我觀則指民眾對自我的看法、觀念或概念。在同一時代中，不同國家的民眾常會持有不同的人觀與我觀；同一國家之不同時代的民眾，也會懷著差異甚大的人觀與我觀。人之所以為人，固然有其生物性與生理性的特徵，但也必然有其心理性、歷史性、文化性、及社會性的特色。有系統有深度地分析與研究特定民眾之人觀與我觀，不僅是生物學、生理學、及醫學研究者的工作，也是人文學（如文學、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如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研究者的任務。總而言之，人觀與我觀的內涵是複雜而豐富的，必須同時採用人文學、社會科

學、生物科學、及醫學的不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從事跨學科與跨文化的系統性探討，才能適當理解一個國家或社會之民眾的人觀與我觀。中國人之人觀與我觀的理解亦復如此。要想真正知悉中國人之人觀與我觀，必須以大樣本的中國人為對象，以適當的問卷或量表為工具，從事長期的施測與分析（包括統計分析）工作。本文擬從跨文化與跨學科的角度，比較中美兩國學者對人與我的看法，以有助於對中國人之人觀與我觀的瞭解。

### 中國學者的人觀

首先要談的是人文學者對人的看法。自先秦以來，就人觀問題提出重要論述的主要是儒家與陰陽家。儒家重視人性的可變性與社會性，並以仁為核心概念，有系統地加以闡述。

\*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儒學家甚至認為人性的社會性是天生的，而且是人類特有的。儒家的人觀特別重視人際關係，尤其是家族生活中的各種人倫關係。

與儒家不同，陰陽家是從陰陽五行的觀點看人。如《黃帝內經》依陰陽所佔比率，將人分為太陰之人、少陰之人、陰陽平均之人、少陽之人、太陽之人。及至三國時代，人物品藻（批評鑑識）之風大盛，月旦人物特重才情、風骨、及氣質。曹魏之臣劉邵承續此風，採用陰陽五行之說，撰寫《人物志》一書，詳論觀人、知人、及用人之道。劉邵認為人有骨、筋、氣、肌、血之五體，弘毅、勇敢、文理、貞固、通微之五質，溫直、剛毅、簡暢、寬柔、恭敬之五德，及仁、義、禮、信、智之五常。五體、五質、五德、及五常之間互有對應關係，又皆與木金火土水之五行相關聯。五體、五質、五德、五常分別指謂人之身體、性情、品格、及德行的五種成分。劉邵進而將人分為九型（剛略之人、抗厲之人、堅勁之人、辯給之人、浮沉之人、淺解之人、寬恕之人、溫柔之人、及好奇之人）與十二型（強毅之人、柔順之人、雄悍之人、懼慎之人、凌楷之人、辯博之人、宏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動之人、沉靜之人、樸露之人、及韜譎之人）。

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直接而有系統地論述人觀的學者甚少。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盛行行為科學與科技整合兩種研究取向。當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見賢思齊，乃由李亦園及筆者邀集院內外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醫學、及人文學的研究者十數位，先後舉行多次學術討論會。最後將歷次會議所報告的論文加以修改，出版《中國人的性格》一書。各章作者分從不

同學科的觀點論述中國人的國民性格、理想人格、人生觀及價值觀，自不免直接或間接地觸及人觀的問題，但却並無直接分析中國人之人觀的著作。

## 美國學者的人觀

早自公元以前開始，希臘醫師 Hippocrates 與 Claudius Galen 即已提出人格（personality）的氣質之說。Galen 假設有四種體液，並依優勢體液之不同，將人分為四種氣質型，即樂觀型、憂鬱型、激動型、及遲鈍型。這是西方的古代學者對人的看法，對當代歐美心理學（尤其是人格心理學）中的人觀的影響甚大。

當代美國學者對人的看法，以社會科學中之人類學與心理學的研究者著墨較多。人類學者 Grace Harris 認為個體（individual）、人（person）、及自我（self）三者是互不相同的。<sup>1</sup>「個體」是一生物學的概念，指的是人類中的單一個體；「人」是一社會學的概念，強調人是社會生活中的主動施為者，能在社會關係與道德秩序中採取實際行動，發揮必要的影響與作用。「自我」則是一心理學的概念，介於個體與人之間，是個體的經驗中心。綜合而言，個體的生物性最強，人的社會性最強，自我的心理性最強。

生活在社會文化中的個體，其人觀是逐漸發展而成的。人類學者 Marcel Mauss 認為人觀的發展歷程可分三個階段：<sup>2</sup>第一個階段中，人的概念係來自「身分人」（personage）的想法。身分人是指依其地位與聲望的高低所論定之人。在現實社會中，從其特定的社會角色與身分，人可進而擁有法律身分，包含一套人際關係網絡中的權利與義務。第二個階段中，人

1 Grace G. Harris, "Concepts of Individual, Self, and Person 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3 (Sep., 1989), pp. 599-612.

2 Jane Fajans, "The Person in Social Context: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Baining Psychology" in G. M. White and J. Kirkpatrick (eds.) *Person, Self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Pacific Ethnopsycholo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67-397.



又擁有了道德性，從而超越刻板的權利與義務，並關注獨立、自由、及責任。第三個階段則賦予道德人以意識性、理性、及個體統合性，完成了人的全部意涵。

人類學者之外，心理學者對人觀亦有不少論述。例如，William Stern 首先提出唯人學（personalistics）之說。<sup>3</sup> 他認為心理學是人學的一支，稱為唯人心理學（personalistic psychology）。從此種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是一類活著的整體（living whole），他是個別的、獨特的、主動的、自足的、及目標導向的。此後，Henry Murray 等人發展出人學（personology）的理論。<sup>4</sup> 他們認為以整個的人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單位，最有效的策略不只是充分探討現在的個人及其所處的環境，還須儘量分析其過去的生活史，也就是要研究其整個的一生。

### 中國學者的我觀

在人文學的領域內，唐君毅在其《人生之體驗》一書中，談到他對自我、自我肯定、及自我超越的看法，並強調每個人都有亘古所未有的「唯一之自己」。<sup>5</sup> 錢穆的〈人生三方向〉（1949）與〈如何完成一我〉（1952）二文，則論及真實我與理想我的問題。<sup>6</sup> 在新儒家的傳統下，杜維明認為終極性的自我轉變或蛻變不只是一種涉及人倫關係的社會性行動，而且是一種涉及精神或心靈發展的動態性歷程。<sup>7</sup> 尤有進者，Herbert Fingarette 曾從孔子之有關自我的思想出發，闡述個人意志與「道」

的關聯，從而認為以道為基礎的儒家哲學，實與道家、佛教、印度教等的「無我」思想契合。<sup>8</sup> 他並論斷亞洲各地的哲學傳統皆主張自我乃是迷惑、痛苦、及束縛的來源，因此哲學的意義端在教人否定與放棄自身，如印度教的「非此，非彼」（neti-neti），佛家的「空無」（emptiness）與「非我」（non-self）及道家的「無為」（nonaction）等概念，均屬此類論述。Fingarette 並進而指出：在此泛亞思想傳統中，孔子似乎是唯一例外，理由是孔子是自我的肯定論者，他以積極主動的語言處理關於自我的問題。在《論語》中，孔子非常強調個人的修養與鍛鍊，認為人應行正道，以進達君子的境界。

在社會科學的範圍中，社會學者李晶在大陸山西省潞村所做的研究發現：在傳統中國人的生活裡，家族觀念具有調節個人之自我矛盾的功能；<sup>9</sup> 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新的社會政策對傳統家族觀念衝擊甚大，後者難以有效調節中國人之傳統自我的內在矛盾。尤有進者，李氏認為費孝通之「差序格局」的概念，<sup>10</sup> 所顯示的是傳統中國人之小我與大我的相對關係或位階。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實施土地改革，強調的是大公。此時所提倡的公我是大公無私之我，或公而忘私之我，也就是服膺與實踐雷峰精神之我；所不贊成的私我是自私自利之我，或私而忘公之我。在那個時代，這種有公無私之我與有私無公之我的對比十分重要，前者成為人們塑造自己或他人之自我觀的範型。

3 William Stern, *Gener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onalistic Standpoin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8).

4 Henry A. Murray,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5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香港：人生出版社，1956年）。

6 錢穆：《人生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7 Wei-Ming Tu (杜維明), "Ultimate Self-transformation as a Communal Ac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6 (1979), pp. 237-246;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Anthony J. Marsella, George Devos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1988).

8 Herbert Fingarette, "The Problem of the Self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A Quarterly of Asian and Comparative Thought*, 29 (1979), pp. 129-140.

9 李晶：《人情社會：人際關係與自我觀的建構》（香港：八方文化，2002年）。

10 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出版社，1985年）。

## 美國學者的我觀

美國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皆對我觀有所論述，但以兼具人文學、社會科學、及生命科學特色的心理學者著墨較多。以自我作為實徵研究的重要課題，始自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Sigmund Freud*, *Carl Jung*, 及 *Alfred Adler* 三位歐洲的精神科醫師都是心理分析學者，皆將自我作為建構理論、從事研究、及進行心理治療與諮商的重要概念。後來他們的自我理論分別傳入北美，對美國心理學者的自我研究產生莫大影響。美國自我心理學發展迄今，其主要特點是強調個人主義取向的自我 (*individualistic-oriented self*)，從而衍生出個人主義取向的我觀。此種我觀所強調的自我是自主的、自足的、自尊的、自重的、主動的、獨立的、及自我膨脹的。

在心理學方面，楊中芳最早對華人自我從事系統性概念分析。她曾提出數項有關華人自我的看法：<sup>11</sup> 一、經由內化當時的道德原則與社會規範，形成道德自我；二、終生增進自我修養，努力控制、改進、及超越自我；三、積極自我反省與批評，找出自己的錯誤或缺點，並加以改進，以避免他人的責備與懲罰；及四、華人的公開我與私密我在內涵上差異甚大。近年來，筆者與陸洛建構華人自我四元論，強調華人自我包含四種結構性要素，分別代表四種次級自我，即個人取向自我、關係取向自我、家族（團體）取向自我、及他人取向自我。<sup>12</sup> 多年以來，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皆兼具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與現代工商文化的特徵，可以說都是一種雙文化社會。此種社會的民眾既有傳統的心理與行為，也有現代的心理與行為，可以說是一種雙文化人；雙文化人的自我

兼具傳統的與現代的思想與觀念，應可稱為雙文化自我。

## 結語

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根據部分中外相關文獻簡論人觀與我觀的內涵。就人觀而言，儒家與陰陽家在先秦時代即已提出重要論述。儒家人觀特重家族之內的人倫關係；陰陽家則依陰陽五行之說將人分為各種類型，代表他們對人的看法。美國學者對人觀亦曾多所論述，如 *Harris* 之重視人的社會性，*Mauss* 之強調人的身分、道德、及理性，*Stern* 之凸顯人的個別性、獨特性、主動性、及自足性。

就我觀來說，人文學者唐君毅曾探討自我、自我肯定、及自我超越的問題，提出「唯一之自己」的推論。杜維明強調個人之自我的終極性轉化，乃是一種提昇精神或心靈的動態歷程。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學者李晶在大陸農村所從事的實徵研究則發現：在傳統中國社會內，家族觀念具有調節個人之自我內在矛盾的功能；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家族觀念丕變，就不再具有此種調節作用。心理學者楊中芳曾系統性地分析華人之道德自我、自我修養、及自我批評，並提出完整而深入的概念架構與研究假設。最近，楊國樞與陸洛共同建構了華人自我四元論，採用實徵方法探討個人取向自我、關係取向自我、家族取向自我、及他人取向自我。他們發現台灣與大陸之大學青年及社會成人的自我，皆兼具傳統的與現代的心理成分，可以稱為雙文化自我。

11 楊中芳：〈回顧港台「自己」研究：反省與展望〉，高尚仁、楊中芳(主編)《中國人·中國心——社會與人格篇》(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

12 參見楊國樞：〈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第22期(2004年)，頁11-80；楊國樞、陸洛：〈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本土心理學研究》，第23期(2005年)，頁71-143。

【多元觀點】

# 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成果評鑑措施<sup>+</sup>

彭森明\*



## 前言

大學評鑑在國內已實施多年，各學門之學術研究成果甚受重視，但以何標準來評量頗有爭論，尤其是理工科學所使用之研究成果評鑑指標是否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之評鑑，爭議更多。

人文及社會學者大致認為以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及 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期刊論文發表數及被引用次數等之量化指標來評量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成果，不適當也不公平，因為人文及社會學門之研究性質與理工科學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sup>1</sup>

首先，人文及社會學研究對象偏重於人與社會，很難使用實驗方式進行，往往需要研究

者親自做長時間觀察、思考、分析與創作，也不容易同時請很多研究生或助理幫忙進行實驗，所以很難量產，而研究問題也往往偏重區域性或本土性，不像理工學科那樣具國際性，因此論文不易在國際性期刊上發表。另外人文及社會學研究成果呈現方式，也有很多不同於理工學門，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除了期刊論文之外，還有專書、創作、展演等。因此國內大學評鑑，以適用於理工學門之期刊論文指標來評比理工為主和以人文及社會學為主之校院，受到質疑與批評。反思工作小組主張：<sup>2</sup> 學界不應該獨尊 T/SSCI 期刊論文做為評鑑依據，應重視多樣式產出及本土議題，更應充分認知中文做為國際書寫語言的重要性。

為了解決此項爭端，政府及相關評鑑機構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座談內容。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中心諮詢顧問。

<sup>1</sup> 黃俊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評鑑指標芻議〉，「國際高等教育評鑑論壇」（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2008年10月3-4日）。

<sup>2</sup> 反思工作小組：《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5年）。

都鼓勵研發適用於人文及社會學研究成果之評鑑指標。<sup>3</sup>不過到目前為止，國內似乎尚未研發出一套完整之人文及社會學評鑑指標，國外也一樣，我們還停留在「只知其不行，但不知要如何才行」的階段裡。為什麼會有此現象？為什麼人文社會學門研究成果尚未有優良評鑑機制？

本文針對此問題，試做分析，並提供一些個人想法，供做參考與討論。

### 評鑑指標應以知識創新與影響力為主軸

要制定適當的研究成果評鑑指標，首先對學術研究要有明確的定義。個人認為人文及社會學門學術研究可分為兩類：探究與創作。探究是觀察、實驗、分析、思考、和批判一種現象、問題、行為、思維、或事務，給予新的闡釋（study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things, give new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即是所謂知識上的創新；而創作是寫出、繪出、演出、設計出、或製做出新作品（create a new product）。兩者共同的特質是前瞻性、創意、與創新，兩者皆能貢獻新知識。

依上述定義，評鑑學術研究成果，在制定評量指標時，應從下列與「品質」有關的面向來考量：

1. 是否有創新性與創意（novelty），如全新的發現與理念或理論。
2. 是否超越現有成果（creativity），如新的或改進的產品。
3. 是否具批判性思考與評論（evaluative, critical analysis），新的立論與辯解。
4. 是否具整合性（summative, synthesis），如跨領域知識之結合。

5. 是否具有影響力（impact）包括啟發性、實用價值，與擴散度等貢獻。

學術研究成果評鑑，即是要評量研究成果具備這些共同面向之程度。以這些面向為評鑑主軸，不僅適用於人文、社會，而且也適用於理工學門。這些評量面向，也沒有國內與國際之分，不須執著於 SSCI 與 TSSCI 高低之別。所以評鑑指標的設定，若著重在這些面向，是評量研究在其領域中「新貢獻」與「影響層面」的質與量，就不會有太多學門之間的差異與爭執。就如比較橘子與蘋果一樣，假如只比較外型、大小、顏色、味道、產期，當然不恰當，但若比較兩者各種營養成分之含量高低，則未嘗不可。即如楊寧蓀所說：<sup>4</sup>人文與科學學門之間擁有許多共通的語言。因此要比較人文社會與理工學門，所使用之評鑑指標宜採計上述相同之特質為評鑑主軸。

不過誰來鑑定研究成果具備這些共同面向之程度，倒是一項挑戰。容稍後說明。

另外，人文及社會學者會有很多不同成果及產品，但凡是不具上述這些研究特質之產品，應分開評鑑。比如翻譯作品及教科書等，對知識之傳播有貢獻，很有價值與意義，如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因此應該給予某種程度的認可與鼓勵，但此種成果算不算是研究成果，有待商榷。嚴格來說不能算是研究成果，因為不符上述研究之原創定義，只能算是推廣或服務工作成效而已，是另一種貢獻，應分開來評量。

### 評鑑項目應多元化

多數學人咸認為人文及社會學門與理工科學之研究特性不同，成果呈現方式亦不同。理工科學門之研究，除新產品設計研製之外，多

3 張慧珠：〈積極建立人文學門教師研究力評鑑指標〉，《評鑑》，第5期（2007年1月）。

4 楊寧蓀：〈人文與科學可擁有許多共通的語言：傾聽相反的意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9卷，第4期（2008年9月），頁4-7。

數偏重於單一問題的解答，其探究與創作成果，大致上以研究報告及論文方式出版，而人文及社會學研究，因性質多元，因此出版方式多樣化，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如專題論述、長篇創作）、「論文集」（如散文、小品文、詩詞、評論等），以及「藝術創作展演」（繪畫、音樂、舞蹈、影劇）。

這些成果都應列入評鑑項目，以充分支持教師多樣性的卓越研究。另外一些與研究有關之表現，如獲補助之研究計畫（專題及整合型計劃），研討會論文（受邀請之主題演講及有評審機制之研究論文），以及國家或專業團體頒發之成就獎及貢獻獎項等，可依照理工學門方式，加入評量與計分。至於其他如期刊編輯、學會委員等是服務貢獻，不完全是研究成果表現，應與研究成果評量分開考量。

### 評鑑計分需兼顧質與量之評量結果

與理工學門一樣，人文及社會學門之評鑑也需要同時兼顧質與量的評量。評鑑需針對前述各項多元產出，計算其數量，並評量其具有前述研究特質相關面向之程度，以兼顧質與量的評量。換句話說，除了統計這些產出之數量之外，應評量其具有前節所列「新貢獻」與「影響層面」特質的程度，並加以量化計分。另外用以評量期刊論文之 *impact factor* 與 *citation index*，亦應適用於專書與論文集。

至於不同成果之重要性比重，可以由同儕討論決定。例如一本專書或論文集巨著，因寫作時間耗費甚久，產量自然無法提升，而且往往是從跨領域的角度（心理學、哲學、社會學、宗教、藝術等），去分析、描述與批判社會百態、景物與人性，達到帶動讀者心靈昇華、或喚醒大眾、啟發大眾、鼓舞大眾的目的，其困難度很高，但影響力可能很廣大，因此其貢獻與價值應相等於多少篇期刊論文，則

可由各人文及社會學門同儕自行討論適當數量間距，徵求共識後訂定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成果的價值與影響力，不同於理工科學門，主要在於對大眾與社會人心、思想、道德、與價值觀等所造成地改變或提升。這必須是評量之一項指標，但如何評量，如何計分，有待商榷。其中指標也許可採間接評量方式，如出版銷售量、讀者之回響狀況等，都會反映出社會大眾受到影響之程度，不妨加予考量。

### 評鑑需避免門戶之見

誰來鑑定研究成果具備前述研究共同特質面向的程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俗語說：自古文人相輕，主要是人文與社會學門之研究不完全是對與錯之分別，因此往往會受到個人理念之影響。尤其是人文創作，它不同於單一問題之解答，問題解答的評鑑較單純，但文學與藝術創作往往是整合型、綜合型研究之成果，也往往是跨領域研究的結晶。因此要評鑑人文與藝術創作，在考量其是否具有原創特質及廣大影響力時，往往需從多元化、多角度、多領域、多層次等面向一齊來思考，做全面性考量。這是與理工科學研究不同的地方。這種評鑑很難，因為評審者學養與理念可能不相同、所能看到的、體會到的、欣賞到的，自然會有不同，造成評鑑偏差。因此如何減少或降低此種偏差是人文社會研究成果評鑑需要克服之一項挑戰。

解決方法之一是評審人員多元化，除了同儕之外，可以邀請不同背景及不同領域的人來評審，因為文學與藝術創作所要服務的對象往往是整體社會及人民大眾。即如一本文學創作可由各種背景之讀者提出評論，而不限於少數同行來評量，更能看出其價值。繪畫、音樂及其他藝術創作，亦復如此。能得到大眾共

鳴，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創作，應是有價值的偉大創作。

總而言之，為避免主觀理念之過度影響，評鑑指標應多元化，除知識上的創新性之外，應包含對社會與文化之貢獻及對讀者之啟發。另外文學與藝術創作之評鑑人員亦應多元化，不應只限於同行之學者。

### 評鑑需給予較長時間來計量研究成果

人文及社會學之大型研究與創作，往往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完成資料之蒐集、分析、思考、推理與撰寫成果，因此以三至五年為一期來計算表現，比較合適。不過話說回來，許多醫學調查研究，也往往是多年期計畫，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都有。因此評鑑時，可以考量研究進展情形及相關之初步成果。另外研究過程中亦應該可以發現一些值得記錄或報導之事情，這些記錄與報導應算是研究成果之一部分。

### 評鑑需建置研究成果評量資料庫

評鑑機制之改進與成長，往往需要先前之經驗。因此建置資料庫，紀錄評鑑所使用之指標與過程，累積評量知識與技能，以做為未來評鑑相同或類似題材之標竿，即如保存法院辦案之判例，做為未來判案參考依據一樣，是一項有價值的工作。因此評審者對任何研究成果之質化評鑑，必須儲存於資料庫中，供未來參考。此方式亦可以使評鑑過程，指標與結果公開化及透明化，以示公信，降低前述門戶之見的弊端。

另外亦應發展國內人文學及社會學研究論文及專書引文分析資料庫，以做為展現研究成果與分析的客觀資料。


不過這項資料庫建置工作，必須是永續性。開始時可由政府支助，待成長至相當程度

時，也許可由使用者付費方式維持，以減少政府負擔。

### 結語

評鑑大學教師研究成果是必然之措施，是不可避免之趨勢。因此人文及社會學者應積極討論研訂適當之評鑑機制，以導致健康的評鑑。雖然評鑑標準與指標不容易制定，但並非不可能。首先要界定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之創新與創意定義，然後依此定義，針對多元成果，制定評量指標，兼顧質與量之評量，採納多方評鑑審查意見，並將意見公開與透明化，以降低或減少門戶偏見，同時建置評鑑資料庫，存儲經驗，做為未來參考與持續改進之依據。若以此原則推展，相信人文及社會學門研究成果評鑑機制將能漸趨完善與適切。

# 關於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評鑑指標的幾點看法<sup>+</sup>



黃俊傑\*

## 引言

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界最受矚目的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大學評鑑的實施及其所帶動大學教育內涵的變化。大學評鑑工作至為複雜，牽涉多方，歐洲與澳洲的大學評鑑雖行之多年，但仍不免為高等教育研究者所詬病，認為難以避免因注重量化指標而忽視本質內涵，<sup>1</sup>以及學界政治（academic politics）因素的介入等問題。<sup>2</sup>臺灣開始推動大學評鑑以後，上述在國外常出現的問題，均在不同程度內逐漸浮現，其中最不容易進行但卻極為重要的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評鑑。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應如何評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為了較為深入地探

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討論「一流大學」應有的指標與內涵，接著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鑑指標。

## 「一流大學」的評鑑指標與內涵<sup>3</sup>

（一）當前「一流大學」的評鑑指標：

從二〇〇六年開始，教育部以特別預算方式在五年時間內投入五百億元新台幣，希望催生臺灣至少一所大學進入世界排名百名之內的「一流大學」。這項新政策的形成，固有其國內的教育與學術因素的考量，但其國外的學術背景更為重要。近年來，亞洲各國均以特別預算投入高等教育，例如日本政府推動經費龐大的 COE 計畫、南韓政府執行 BK21 計畫、中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座談內容。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sup>1</sup> 參考 Kauko Hamalainen, "Common Standards for Programme Evaluations and Accredi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38, 3 (2003), pp.291-300.

<sup>2</sup> 參考 Lee Harvey, "The Power of Accreditation: Views of Academic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6, 2 (July 2004), pp. 207-223.

<sup>3</sup> 較詳細的討論，另詳拙作〈「一流大學」的指標與內涵〉，《通識在線》，第9期（2007年3月號），頁8-11。

國大陸也有「211 工程」，並重點投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在上述國際高等教育競爭的壓力之下，臺灣教育部所推動的「邁向一流大學計畫」，可說是在國際競爭的嚴峻形勢中不得不然的政策。

教育部依據立法院的決議，要求獲得「邁向一流大學計畫」特別預算補助的十二所大學，除了百分之五十可以由各大學自訂考評指標之外，其餘百分之五十的考評指標如下：

- a. 人才培育：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培育及相關產業實用人才培育質與數增加。
- b. 國際論文總數及影響指數排名之提昇。
- c. 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
- d. 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數增加。
- e. 平均每年輔導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成長。

以上這些剛性的指標，因為具有客觀性，所以各校之間具有可比較性，從教育部的行政管理立場來看，確實有其可操作性，便於向法院交代。

## （二）指標之問題

但是，細究這些所謂「一流大學」的考評指標，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指標實潛藏著以下幾項特徵：**（1）完全以定量指標為準，忽視定性指標**：教育部對十二所獲得特別預算補助的大學，所訂的考評指標完全以數量為考量，如人才培育數、國際論文總數、延攬國外人才數、國際合作數以及產學合作計畫數之增加等等，質性之指標完全不列入考量，流弊所及不能免於「數量性思維的陷阱」。**（2）強調科技發展重於人文社會之研究與教學**：教育部所訂指標中之「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及相關產業

實用人才培育」、「國際論文總數」、「產學合作計畫數」等，莫不是以科技研究為考量，相對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頗受忽視。**（3）重視大學的研究功能遠過於教學功能**：教育部的指標反映了 19 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興起之後，大學重研究而輕教學的一般傾向，而且強調「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數」，更是具體展現亞洲地區學術教育界對「國際化」的焦慮。

因為教育部考評指標潛藏著以上三大傾向，所以雖然具有可比較性與可操作性，但是如果徹底執行落實，則大學教師終不能免於淪為 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或 SSCI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論文的生產機器，而大學的社會功能也將窄化為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階級後備部隊的培養工廠，而大學在經濟功能上也將被轉化為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工廠，使大學成為「有體無魂」的行屍走肉！

在教育部考評指標引導之下，獲得特別預算的大學在學校治理上，許多早已存在多年的現象更發展，其顯而易見者包括**（1）大學治理重機制而輕氛圍**：為了因應這一套考評指標，許多大學必須以「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sup>4</sup>的標準來衡量教師的研究績效，流風所及，在一套一套的機制之下，大學作為探索真理、砥礪德行的殿堂的氛圍杳不可尋，大學教師之間以及師生之間情誼日趨淡薄。**（2）大學治理重視「可操作性」而忽視「不可操作性」**：在校園民主的客觀形勢之下，大學各種業務的運作如教學評鑑、教師評估、教學或研究獎勵等等，在公正、公平、公開的形式主義要求，常常必須由各單位推選一人出任委員，凡事訴諸投票，以票數決勝負，在表面的「理性」之下潛藏著巨大的「非理性」。

4 一九四七年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1895-1973) 和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分析啟蒙文明具有自我摧毀性，並大力抨擊啟蒙文明所催化的工業文明中「數量化」、「標準化」與「商品化」的重大弊端。參考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2)。他們所指出的啟蒙文明的三大弊病，完全出現在現代大學之中。



### (三) 理想的「一流大學」應有的內涵

從以上的論點出發，我們就可以重新找尋所謂「一流大學」應有的內涵，至少應包括以下三個組成部份：**第一，一流大學應致力於知識的創新**：自從十九世紀以後，大學的研究功能大幅提昇，大學作為知識創新的場所之功能特別受到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自然科學各學門在大學校園中快速擴張，因此，大學的知識創新工作也多以尋求「確定性」為目標，並深信知識的「確定性」可以立即經由一套程序而獲得驗證（verification）。但是，弔詭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部份學門以及最深刻的論著，常常是以邁向「不確定性」為其目標，認為「理解」是一個永無終止的過程，「真理」不能通過數量方法而完全把握。這種重視「解釋性」（而非「描述性」）的學問，在現代大學完全受到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以及運作邏輯的支配之下，常常不能獲得關愛的眼光。從這個角度看來，大學的「知識創新」的範圍也可以再適度擴張，並重新定義，大學應以更謙卑的態度面對廣袤的未知的世界。**第二，一流大學應參與學生生命的成長**：大學在致力於知識的創新與傳播的同時，常常無力承擔或甚至放棄協助學生生命成長的教育責任。在現代大學的教研活動中，學生作為學習主體，主要的學習內容是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各種知識，很少觸及「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等內省性的課題。因此，現代大學的教學活動中「外馳」遠大於「內省」，學生的價值意識多半處於沉睡的狀態。**第三，一流大學師生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不公不義應有批判的能力與節操**：最近十餘年來，各大學為求「客觀」評比教師的教學績效，常以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鑑平均值，作為決定教師教學成績之判準。這種制度固然可以提醒教師改進教學工作之欠缺，但是，流

弊所及也使許多教師從教育的立場退卻，淪落為知識百貨公司的售貨員！

總而言之，以「邁向一流大學」作為高等教育辦學的目標十分正確，氣魄恢宏，但是，我們必須首先嚴肅釐清「一流大學」的定義及其內涵在於內外交輝、學問與生命融貫，這樣我們才能校正我們辦學正確的方向，揚帆出發。在上述定義下的「一流大學」之中，學生價值意識的啟發當居於最重要之地位，理工、醫農、生命科學各學科所有教師的教學，均涉及「價值」問題，均有其教學之責任，其中尤以人文社會科學居於最關鍵之重要性，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最能將「事實」與「價值」合而為一，使知識落實於學生的生命成長之中，使學生成為有批判能力的知識份子。

###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鑑指標

在上述理想中的「一流大學」的建構中，人文社會科學最為重要。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鑑指標應如何設定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 (一) 當前評鑑指標之優點及其問題

首先，我想指出：現在漢語學術界以英文發表並收錄於 SSCI 或 A&HCI 的期刊的論文之數量作為評鑑指標。這種評鑑指標的優點在於因為易於與英語學術界接軌，而較易取得可比較性，也較易提昇研究成果的國際能見度。所以，以期刊論文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之評鑑指標，當是可行的一種方法。畢竟，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中如計量經濟學、分析哲學等，期刊論文是較好的研究成果展現方式。

但是，如果完全以英文 SSCI 或 A&HCI 期刊論文為**唯一評鑑指標**之做法，也很容易產生嚴重的弊病。第一，這種評鑑方式墮入「形

式主義的謬誤」(the fallacy of formalism)：完全以收錄於 SSCI 或 A&HCI 的論文篇數作為計算標準，而未能顧及論文所提出之論旨或命題，可謂重量不重質。第二，以英文 SSCI 或 A&HCI 期刊論文為唯一標準，不免**過度服從英語學術界的人文社會科論述霸權**，因為在英語學術界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期刊大多有其特定之學術關懷或問題意識，甚至有其偏好的方法論或知識論之基礎。這些問題意識、方法論或知識論傾向，常常有其西歐或北美之地域性的學術傳統或文化作為背景，與非以英語為母語的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學術或文化傳統常有巨大差距。因此，近年來臺灣過度強調以英文出版收錄於 SSCI 或 A&HCI 期刊的論文，流弊所及，使臺灣學者與歷史悠久的漢語學術傳統日益疏離，其極端甚至易於流入「學術自我殖民化」的悲劇！第三，在人文社會科學界過度強調發表論文之篇數，將**導致學者致力於淺而窄的專精研究，以至於無力從事需要長期時間累積的專書之撰寫**，其流弊所及將使廿一世紀難以產生偉大的學者如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馬克斯 (Karl Marx, 1818-1883) 等。

## (二) 人文社會科學評鑑的轉向

針對當前以 SSCI 或 A&HCI 論文篇數作為評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之指標所造成的流弊，我建議以下的「評鑑的轉向」：

(1) 評鑑原則從「形式主義」(formalism) 轉向「本質主義」(substantialism)：我們可以考慮除了計算刊登於 SSCI 或 A&HCI 期刊的論文的篇數之外，轉向為注重具有審查制度的出版社所出版的專書，並聚焦於該書所提出之創新論

旨或命題，以及創新見解在專書之研究領域中之貢獻等問題。

(2) 評鑑指標建議以下三項為主：

- a. 研究論著在知識上的創新性；
- b. 研究論著對學生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啟發；
- c. 研究論著對社會與文化之貢獻。

以上第一項指標可以在較短時間以純學術的衡量機制進行評估，但第二及第三項指標，都必須於在較長的時間進程之中才能衡量。從這項事實，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重大差異之所在。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大多可以立即經由科學社群的驗證 (verification) 而獲得證明或反證；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則相對而言需要在較長的時間流程之中，才能獲得印證。

## 結論

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張光直 (1931-2001) 在一九九四年曾經問：「為甚麼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sup>5</sup> 張光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造成漢語學術界人文社會科學沒落的原因至為複雜，第一個最具關鍵性的因素當是廿世紀中國知識界中「科學主義」(Scientism) 心態的昂揚。<sup>6</sup> 在「科學主義」的新宗教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的「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 深受自然科學的「運作邏輯」的宰制。以 SSCI 或 A&HCI 論文及數量計算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就是這種宰制下的一種表現。在自然科學的「運作邏輯」的宰制之下，凡是不能「數量化」、「規格化」、「標準化」的學問，都被邊緣化

5 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擠身世界主流〉，《亞洲週刊》(香港)，1994年7月10日，頁64。

6 參考 D. W. Y. Kwok (1932-),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65).

或甚至被認為不是學問。

第二個原因當是廿世紀漢語學術界的許多著作常以西方經驗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架構，以東亞經驗印證西方學術理論。例如，廿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侯外廬（1903-1987）就宣稱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一書確實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克斯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理論的亞洲版本之註腳。<sup>7</sup> 在漢語學術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常受西方學術界宰制的狀況之下，要求以發表於收錄 SSCI 或 A&HCI 的英文期刊論文作為評鑑之指標，更是進一步以英語學術界的問題意識與評鑑指標，宰制漢語學術界，使後者更難以植根於自己的文化資源與學術傳統，更難以開創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學術議題。

從本文的討論來看，張光直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一個牽涉諸多複雜因素與歷史背景的問題。展望廿一世紀，漢語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健康發展，必須從「科學主義」的魔咒中掙脫出來，而適度修正以 SSCI 或 A&HCI 的英文論文作為評鑑指標正是新的出發點。只有超越「數量化」、「標準化」、「規格化」的論文評鑑指標，我們才能從「形式主義」邁向「本質主義」，轉而在期刊論文之外，更以嚴謹的專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鑑的新標準，為漢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開創新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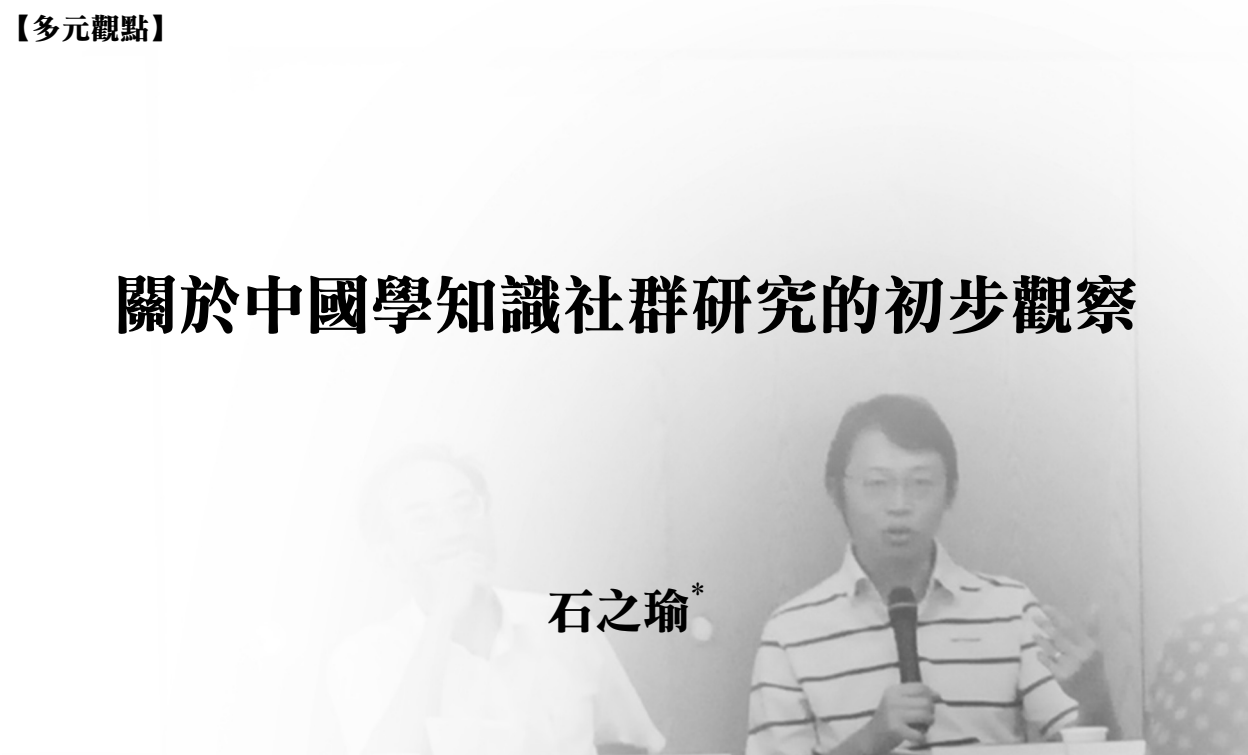
---

7 侯外廬：〈自序〉，《中國古代社會史》（上海：中國學術研究所，1948）。



【多元觀點】

## 關於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的初步觀察



石之瑜\*

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正式開展迄今約十八個月，初步有下列六個大方向上的觀察：

首先，是關於華僑研究與中國研究，一般研究者區隔中國研究與華僑研究，但是研究團隊目前有如下不同反省：華僑從文化上看待當地國不同於從政治上看待當地國，從文化上面對當地國，是透過某種中國身分從中心往邊陲看，但從政治上面對當地國，是以少數民族公民身分，且被視為某種中國代理人的印象中，從邊陲往中心看。所以華僑與當地國的互動，受到華僑的中國認識與當地國的中國認識所影響，而他們各自的中國認識則受到他們同中國的相互關係所影響。因此中國、華僑與當地國之間有相互構成的身分意識，華僑研究受到中國研究的間接影響至鉅，也影響中國作為身分

的含義，從而重寫了關於效忠、中心、祭祖等中國文化價值的內涵。

其次，是關於近代史的延續與斷裂的反省。一般日本的當代中國學敘事，習慣居於戰後的位置看待戰前的中國研究，因而對戰前提出思想脈絡中發生轉向與斷裂的問題。本研究重建戰後中國學研究與戰前中國認識之間的延續性，則關於戰前思想界所謂的斷裂，並非真實的斷裂，而是體現日本思想界因應現代性衝擊採取了不同方法，輪流在不同時期或情境中受到思想家的青睞；同理，戰後與戰前之間的斷裂，也屬於因應現代性的不同方法，從戰後出現的論爭中，足以反映戰前的所謂斷裂是長期歷史發展周期中的正常現象。如此，則戰爭所帶來的中國認識上的斷裂，成為戰後思想界

---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區隔自身與戰前歷史的論述手段，並非本質的斷裂。

再其次，是反省關於英語文獻中對日本及中國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敘事：一般文獻認為西方主義就是東方主義的對立面，包括日本對中國有東方主義，日本與中國對西方都有西方主義。本研究團隊有不同體認，指出所謂日本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敘事中，敘事者的自我認識主要不從與他者對立而來，因此沒有必需製造或鞏固差異的必然性。相反的，在日本的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敘事中，主要的論述策略反而是迴避他者，邁向某個文化理想，因此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類似是中心與邊陲的關係，簡言之，在日本中國學文本中關於自我的身分意識，並非真的從與中國在本質上的差異為主，而只是以西方為文化中心，並試圖臨摹西方中國認識中的東方主義，因而是偽東方主義，故不同於東方主義。

第四，是發現對於自我身分（self-identity）與自我觀感（self-image）加以區隔的必要，以身分為主時必須建構差異，且身分內容跨越時空均一致，以觀感為主時必須消弭差異，且觀感總是因應情境而調整。東亞各國中國學者面對中國時，與英語作者面對中國時的取向不同。一般英語文獻作者本身大致有其身分意識出發，也假定此一身份不隨研究對象而轉變，因此在決定如何選材或寫作角度時，多數追求在某種普世的理論框架或法則下，從差異界定中國。東亞各社群的中國研究者則大致重視觀感，則對於論述時的情境、對象或議題，有意識地保持較高的敏感度，因此對中國論述的方向，可以依據情境需要選擇不同的角度，與作家本人當下的社會位置及社會關係網有關，因此不存在透過差異將中國他者化的需要，從而反射出英語中國研究的論述策略涉及英語作者對自身的想像。

第五，從日韓學者自居中原文化正統開始，接著回溯到歐美學術界自身對西方中心或歐洲中心的中國學產生反省，並要求建立中國中心的國學，其中所引起的共同問題是，中國中心是什麼。本計畫發現，海外華裔學者與臺灣學者面對這種中國中心的呼喚時，所可能產生的回應，即使他們本人未必有中國中心的意識，但是從他們的研究中卻能夠歸納出兩種既有的響應方式，一種是以社會主義國情為內涵，另一種是以歷史文化為內涵，都足以對歐美國學採取批判，並因為對中國研究提出不同的解釋與方法，儼然是站在中國的位置辯護，不接受歐美中國學家根據他們自己的歷史經驗或問題意識所解讀出來的中國。由於社會主義改革的國情論與歷史文化的內戰史觀區分成兩種視野，使得中國中心的知識社群在過去難以形成，加上這兩種視野分別受到兩岸之間與內部政治關係的影響，自也無助於中國中心的知識結盟。

最後，新近在日本與韓國流行的亞洲主義，且逐漸感染到大陸與臺灣的知識界，對於形成中的中國中心問題意識則有消解作用。這種以亞洲為視角的知識論主張，是屬於東亞知識界去中原化的本體論嘗試，將原本的中國放進亞洲觀察，使得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身分被超越，並在亞洲化之後成為各種村落、城市、區域之類的分析物件。亞洲化方法論一方面抗拒了歐美中國學視中國為觀察單位的本體論，延續了某種抗拒西方中心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幫助每個東亞中國學的研究社群回避各自所屬政治群體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問題，包括日本與中國之間歷史認識問題中的國族意識，韓國爭取超越中國在世界現身的競爭性身分意識，與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後與內戰遺緒下的「出頭天」意識。亞洲化與天下觀兩種視角之間的互動，應是中國學方法論在未來十年的重要熱點與難點。

【多元觀點】

## 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人的儒學反思意涵 ——由周定山的〈「儒」是什麼？〉一文談起<sup>+</sup>

金培懿<sup>\*</sup>

近代以還日、中、台三地的儒學反思思潮，乃受到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狩野直喜的啟蒙，而近代日本學者反思儒學的目的乃在建構「古今殊異」、「和漢殊異」的「新漢學」。而周定山作為一位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化人，我們透過其「公開言論」與「遮蔽文本」對其反儒學主張進行檢討，大致明白周定山的儒學反思目的，不僅與近代日本以還的儒學反思企圖有異，也與當時中國大陸學者試圖藉由對「儒」之意義、源起，與「儒學」之稱呼、流變等議題的熱烈探討，而來卸除文化思想的傳統框架，以求反封建進而開化中國本身的目的不同。

周定山〈「儒」是什麼？〉一文，不僅藉由日人狩野直喜的儒學論述，表達其強烈抨擊中國自古以來之儒者、儒學的反儒意識，還間接使得日本殖民政權強制推行下的儒學——「漢學」與「孔教」，可能藉由反思「儒學」

這一傳統文化而獲得思想論述上的「轉向」<sup>1</sup>。周定山更指出：奉行「真孔道」的真儒，必須是熱愛民族國家的、自我覺醒與發揮同胞愛並反戰的、反傳統威權而為勞動百姓代言的知識分子。然我們從周定山的儒學論述亦可看出：其不僅遠離了狩野直喜原文的問題意識與核心價值，同時也展現了某種偏執「錯誤論述」中所存在的具體真實。而這一具體事實便是其所揭櫫的儒學反思意涵乃在：其於戰前便預告了臺灣在政權不斷輪替，主流文化不斷變遷下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覺醒，乃是一種「個體為其自己」（individuality-for-itself）的文化變遷之覺醒。

日治知識分子面臨「中國性」與「臺灣性」的區別時，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通常呈現出曖昧混同的狀態，這也是殖民主的日本所提倡的「孔教」或「漢學」所以會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新舊知識分子所接受的理由所在，此乃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本院訪問學者座談內容。

<sup>\*</sup>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sup>1</sup> 有關「轉向」的定義與價值，詳參鶴見俊輔：《日本精神史》，李永熾（譯）（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18、164。

因為大多數人的身分性和主體性總是複雜的，並且隨著歷史演進而持續變化。換言之，大多數人必然地將對其他的身分保持開放與接納，以獲得可能或更大的生存空間，此即德里克（Arif Dirlik）所說的「策略的含混」。<sup>2</sup> 此種情形下所提倡主張或認同的儒學，難免具有「工具性」與「混同性」。而臺、日之間所存在的文化上的家族類似性，難道不存在於臺、中之間？難道儒學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價值，其不曾在日治時期作為召喚「國族」意識的能量，同時又區隔出「日本性」與「臺灣性」的儒學傳統之異質性？進而確立臺灣自我文化認同的主體性嗎？甚至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學作為調和現代與傳統價值的文化轉化介質，不也有發展出異於日本或西洋之「現代性」的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之可能。否則，我們如何相信林獻堂所謂：<sup>3</sup>

到底是平等還是同化呢？說平等，我以為是把兩者的價值看作等同之意。至於同化，則是不把兩者認為是平等，而要使其成為同一個東西。那麼，這一來則是把那一邊同化到那一邊去的問題了。〔……〕若說強要本島人同化到內地人去，那我想本島人是沒那麼容易認同的。何故呢？因為，人在本性上都具備有向上之心，而本島人早已擁有自己是文明人的自負。

這個自信滿滿的文明／文化宣言的可能性。而這個文明的傳統難道是與傳統割裂的嗎？我們對上述問題的省思，在日治時期是如此，今日

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如果「轉向」是個人或集團在面對國家政治機器行使強制力時所產生的思想變化，而錯誤中所含的真實又比真實中的真實對我們更具重要意義，則我們難道不應該從周定山的偏激儒學論述中所可能包涵的各種「錯誤」<sup>4</sup> 中，析辨出文化轉向過程中的歷史真實，而來發現處於壓抑、矛盾、隱晦、曖昧的日治歷史脈絡中，任何有關傳統與文化的細微且曲折的，甚或偏執而極端的那個更可能貼近「真實」的儒學論述意義，即便是從一個看似堅守臺灣立場的儒學論述。

於是，我們有可能發現周定山所認為的「真正的孔道」，並不是立足於政治優位而來俯瞰被殖民之臺灣人民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官方宣傳「漢學」，也不是無視現實政治、經濟困境下，一味提唱忠、孝、仁、愛等儒家倫理的高調「思想善導」口號，當然也不會只是盲目拉抬儒學地位，卻同時抬升了殖民主日本帝國之「國體」論價值的對工具性儒學「孔教」的維護。而可能是一種將臺灣納入東亞文明成員之一份子的，以「個體為其自己」的存在狀態，並立足於東亞本位，同時又能關注新學，在傳統中涵容新舊、會通東西，進而在「融新」、「化西」後，在「溫故知新」下所從事的文化選別到文化再創造。

一位不從事「儒學」研究，不以「儒」為業，卻對「儒」與「儒學」有著深刻反省與真摯企盼的文化人——周定山，其或許遠離學術定義下「臺灣儒學研究」之代表性儒者的中心，但卻充分凸顯出社會、政治或文化上的邊緣人物，常常才是意義聚焦的所在。

2 關於「策略的含混」，參見謝少波、王逢振（編）：《文化研究訪談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7。

3 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邱若山（譯）（臺北：草根出版社，2002年），頁332。

4 筆者此處所謂的「錯誤」，並非只是意指周定山於〈「儒」是什麼？〉一文中，諸如引言出處有誤、所引原文有誤字、或引文有所缺漏和衍增、甚或其行文難免窺見受日文語法用字所影響等問題，而是試圖指出在歷史進程中，當整個國族文化在進行轉換與接合的過程中，或因為國家機器的壓抑與強制運作力，或因為個人特殊的生命經驗與價值取向的緣故，每個個人在歷史現場中充滿曖昧、矛盾，甚而偏執、極端的對自我或他者文化的思考、想像的改變與轉化之「真實」，特別當其是一種「錯誤」態度或「偏執」觀念下的真實存在。



【多元觀點】

##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 ——荀子心與道的關係片論<sup>+</sup>

林宏星<sup>\*</sup>

心與道的關係在荀子那裏是一個學者論之既久、亦複雜有定論的論題，我希望通過提綱揭領式的說明，從另一個側面呈現荀子對此一命題的一種可能理解<sup>1</sup>。

荀子言心具有明顯的認識功能和特性，自不待言。但心與道的關係是否是一個主客對待、內外相合的關係？即頗有爭論。

基本上，荀子所說的心既具有明顯的認知的特性，相對於五官而言具有主宰的「天官」的作用，但也具有意志、情感、欲望等等不同的功能，故而荀子所言之心應該是包括知、情、意等多種作用在內的功能總體概念。就心之認知作用而言，荀子固然強調心之「天官」、「徵知」的意義，且屢言之而不足，然而，心之「徵知」最終是為治道而非知識本身

服務的，換言之，認知在荀子那裏是心的諸多功能中的（主要的）一種，但心的這一認知功能卻未獲得獨立的性格，而只是作為「壹於禮義之道」的仲介。毫無疑問，孟、荀言心互為相異，蓋孟子之心原本具足，此良知、良能之心乃天之所與我者，只要有反身而誠地求之之信念即可盎然而現，沛然若決。然而荀子卻未有如孟子般直下肯定人之有天生的惻隱、羞惡、辭讓之心，故其對心缺乏如孟子一樣的超越的反省。荀子言人之異於禽獸者不同於孟子所言，在人之有義、有辨，人之可以為禹舜者在於人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可以有能仁義法正之具。但在荀子，此義、辨、質、具一方面不從人性觀（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上說，而從人觀（the concept of person）上說；另一方面，此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五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

<sup>\*</sup>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

<sup>1</sup> 為避免理解上的歧義，筆者首先肯定，與孟子的道德主觀主義不同，荀子的思想在本質上毋寧說是一種道德實在論。

「具」，甚至包括向上之能、好義之心對人而言皆是「生而有」的，但此「生而有」的東西在荀子須刻刻與積偽能習相聯繫、相緊切，以使此質、具以及（好義、能辨之）心能在實踐領域呈其實用，見其實功，並進之以避免「梏亡」。「積」和「學」在荀子那裏正是使此好義、能辨的向善之心始終保持其應然之自覺，避免沉埋、喪失的關鍵，亦使此心之所好、所辨終能去其私、臆，呈其客觀的關鍵，也正因為如此，由「積」和「學」而來的認知心與人「生而有」的內含義辨質具的應然心須與不可分離，而前者乃是使後者全其實功的不可缺少的一環。荀子之心的確包含有一向上之能、向善之能，而且這種向上、向善之心能在荀子那裏一定是「生而有」的而非後天養成的，只不過這種「生而有」的向上、向善的質具知能不是如孟子般那樣，當下俱足，擴之即盈科放海，在荀子是需要通過對物件物和禮義之道之學習，以使此內在的生而有的質具知能呈其實有的完整的形態。

唐君毅不同意將荀子之道看作是完全的外在於心的客觀物件，認為如果道是客觀外在的，即在荀子思想中又如何保證聖王之法乃是所有人所應當且必須效法的物件？於唐君毅，荀子言心與道不同於孟子之即心性之流行以言道；而荀子之道初在心外，當它被心所知之時，則已在心內了，但問題是此道在根源上究竟在心內還是在心外？所謂道被心所知時已在心內，則這樣一種心與認知心又有什麼本質的分別？

首先，我們肯定，荀子所言的道是君子之道，禮義之道；其次，對於心與道的關係，從理論之核心處看，即便我們說道既在心內又在外（如唐君毅），問題仍未獲解決，還得問心與道的奠基關係如何。於此，如若疏通荀子之思想整體，即其言「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又言心乃「道之工宰」，則其

心與道之關係至為明顯。不過，荀子特重「君子者，禮義之始」一義，尚待分析。我們試看荀子的以下一段說明，其云：

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致士》）

依荀子，土地、人民、道和法乃是國家之根本，而君子則是道法之根本。此處關鍵的一句是「無君子則道不舉」，依荀子，君子與眾人有同有異，同則有相同的質具，有相同的生而有的好義、向善之心，異則異在是否用心一也。所以，在荀子看來，道之實行全賴於君子。然而，君子之心之於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學者認為，君子是善於向外學習道，所以他的言行能夠合乎道，這種解釋其實只是其中的一義而已。如若從文法結構來分析，即在所謂「無土則人不安居」中，「土」是「安居」的前提，「安居」是「土」的結果，那麼，由是而類推，則「君子」是「道」的前提，而「道」則是「君子」的結果，此時，君子之心與道的關係似乎就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內與外的關係，或者只是單純的善於學習的關係，毋寧說，「道」本身即是君子（之心）所創造出來的結果，君子依心之所言所行當下即是「道」的表現。然而，這種詮釋是否過度抑或強詮？我們再看荀子的另一段說法，荀子云：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

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王制》）

楊倞注：「始，猶本也。」此句猶言君子是生禮義（之道）之本，故云天地生君子，君子生禮義（之道）。無君子，則自然世界失其秩序，人文世界失其統領，而社會人群呈其至亂亦理有固然，勢所必至者。此處，君子所以能至此生禮義、理天地的境界，其間原因就在於君子能「誠心守仁」而與百姓有別，至是而可以至此境界，故在〈不苟〉篇中荀子云：「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誠心是君子之品格，君子能誠心，即全心是道，即能變化代興，能神而化之，此亦即前此所言的能「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能「制割大理而宇宙理」。

問題在於，荀子何以如此重視君子（之心）與道的關係？唐君毅在理解荀子之「統類心」時特別重視其所包含的歷史文化意義，而此一意義的其中一個意思在於，荀子之統類心其實表達著儒家「愛有差等」的意識。但這一意識何以在荀子那裏被汲汲提起，並在心之功能中被刻刻緊切？直接地看可以被認為是對墨子「兼愛」思想的一種反正，而從更為廣闊的眼光看，即不妨把它看作是對戰國中後期，隨著傳統的宗法等級制度的土崩瓦解，諸子平等意識之興起的一種反撥。明乎此，我們即可理解荀子何以特別重視等級之劃分，特別重視人格等第之劃分，特別強調聖人君子與眾人之差別。就人生而有之質具以及人之有向善之心能而言，聖人君子與眾人無別，別只在「積」與「學」；另一方面，荀子在明陳聖人君子與眾

人無異，故人皆可以為禹舜的同時，又要在理論上對抗戰國中後期興起的眾人平等的「早期啟蒙」意識，所以，他明確地主張聖人君子與眾人的不同，認為君臣父子、貧富貴賤之等級秩序具有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的性質。依荀子，聖王和君子都是先覺者，都負有覺後覺的莫大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看，君子也可以說是素王，亦即哲學意義上的王，他們全心是道，關切之主題是何為好的生活，何為合乎先王之道的秩序，因此，他們為天下立法，以俟董理的君王。或許在荀子眼裡，人民只需要行義守禮，而不必知禮義（之道）與心之關係及其由來，更不必知天。或許因著這一觀察問題之角度，有學者認為孟子雖評楊、墨甚厲，然而在荀子看來，正是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偏離了「貴賤有等」的先王之制，對百姓「濫於同情」，故荀子批評孟子以及鄒魯之儒僅至「俗儒」之境<sup>2</sup>。的確，眾生平等、民貴君輕是善好的價值，不過，在荀子看來，它們卻是哲學的天敵，是先王之道的天敵，當在其所清掃的「奸言邪說」之列：若人人都是君子、聖王——原則是允許的，但事實上卻很難很難——天下反倒沒有秩序。

果如是，則荀子謂「無君子則道不舉」、「無君子則天地不理」，此君子之心與道的關係應有別解。若說君子所以為君子乃在於其善於學習，在於其禮義積偽之功過乎常人，此即意味著道在心外；若說君子所以為君子乃在於其所言所行當下即是道的表現，此即意味著道本身即為君子所自覺地創造，果如是，即道為創造物而不可言道在心外。但所謂「道為創造物」畢竟何意？此則涉及到荀子對「道」的雙重意義的瞭解。相比於其他儒者，荀子思想之最大特色之一在於他重概念之分解，如其論儒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論士有通士、公士

2 參見王慶光：〈論晚周「因性法治」說的興起及荀子「化性為善」說的回應〉，《新原道》，第1期（2003年10月），頁150，此文頗有意味。

和慤士之別等等。今以荀子論禮為例，荀子首先區分「儀」與「禮」之不同，不止於此也，荀子言禮又復有作為規範法則之「禮」與作為「誠深」、「誠大」、「誠高」的禮之「理」的分別（《禮論》）。規範法則之禮是人們在實存世界中所應當遵循的規矩準則，這種規矩準則可以被認為是外在於人的、現成地擺在那裡為人們的心知去認識把握的物件，而作為禮之「理」的「禮」乃是此規矩準則何以可能的根據，此根據並不可能作為某種現成的外在物件擺在那裡而為人們的心知去認識。

假如這種理解成立，我們即可轉而討論荀子心與道的關係，蓋在荀子那裡，道亦可有雙重意義，一為散開地說，是作為具體的行事方式或典章禮法制度之道；一為凝聚地說，是作為典章禮法制度何以可能之根據之道。前者是人的心知的認知物件，外在於心；後者是作為行為規範或價值準則何以可能的根據，難於看作是外在於心的客觀現成物。禮義之道實乃兼二者而有之，缺一不可。唐君毅以荀子謂人性既惡，但仍承認「人之欲為善」，人心可以「守道而禁非道」，以反證心之與道非為純外在的關係，而可為一內在的關係，誠有啟發，然其所作亦只是一補充性之說明，未足於從根本上顛覆荀子心與道之奠基關係，此中理路固需反復斟酌，殊非以氣魄承擔所可了斷也。

【多元觀點】

## 關於昭和初期「近代超克」論的一個考察 ——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sup>+</sup>

陶德民<sup>\*</sup>

近年來，關於竹內好的國際研討會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二〇〇四年）、中國上海（二〇〇五年）和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二〇〇六年）等處相繼召開。隨之，戰前的「近代超克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sup>1</sup>

「近代超克」論的提出本身可以說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一個政治事件。即《文學界》雜誌社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召開「近代的超克」座談會，出席者有《文學界》同人、「日本浪漫派」文學家和京都學派的哲學家等十三人。座談會上的發言和論文於該雜誌同年九月號和十月號刊出，河上徹太郎在「結語」中指出，座談會是在「大東亞戰爭」開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日本天皇發佈對英美宣戰詔書）所引起的「知的戰慄」仍在持續時所舉行，而會議記

錄則為「日本人的血」與「西歐知性」的「相剋」。而津村秀夫的〈應破甚麼〉一文，更直接道出了所謂「近代超克」論的政治含義所在：<sup>2</sup>

我們最大的敵人可以說是美利堅主義。進而言之，我們的命題是人間精神應該如何與物質文明及機械文明作戰。一般所說的美國流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在根柢上亦與此有關。而這物質文明及機械文明的高度發達又為金融資本家和資本力的放任跋扈提供了最好的舞台。〔……〕這次大戰正是軸心三國面對世界相的末世性墮落奮然而起，訴諸最後手段的一場鬥爭。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月卅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

<sup>\*</sup> 關西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學專修課程教授、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sup>1</sup> 參見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編著）：〈序〉，《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內好を再考す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年）。

<sup>2</sup> 河上徹太郎等：《近代の超克》（東京：富山房，1979年），頁135-136。

不過很顯然的是，「近代超克」論也包含了超越現實政治的廣泛的思想含義，即對席捲整個世界的西方近代的文明和文化形態及其實質加以反思和批判。這也就是戰後日本以及美國的思想界一再對「近代超克」論加以分析，以「救出」其中合乎情理之部分而予以重新評價的基本理由。<sup>3</sup>

筆者則試圖根據新發現的有關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的史料指出，在一九四二年即昭和十七年召開的上述座談會的內容，其實在昭和初期即昭和時代的第一個十年之中已經可以找到與之呼應的廣泛的思想根源。

一九二六（即大正末年、昭和元年。同年十二月改元）年一月上旬，內藤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一文，發表了他為期一年的歐洲旅行的觀感，提出「工藝品乃測量各國文化程度之尺度」的觀點，並據此對他所認定的文明強大而文化貧瘠的英美加以批判，議論之中含有即便從今天看來也頗為發人深省的觀點，有些甚至可以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的倡言。

近代文明雖有以工業的進步作為標準來衡量國民水準的傾向，但這絕不是正確的見解。以批量生產為主體的工業有磨滅人類個性的傾向，故這並不符合人類真正進步的主旨。最終，能夠滿足個性要求的工業

必將興起。而工藝作為其中間產業，最後必將導致工藝的手工化。<sup>4</sup>

〔在見過巴黎各處精美的雕刻後〕倫敦市內各處的銅像、石刻等之拙劣和馬虎令人吃驚，遠不如日本這方面有希望。在看了博物館等以後，更覺得日本在古代雕刻等方面要優秀得多。由此，不禁產生了對英國國民的侮蔑之念。特別是當時溫布利在開英聯邦博覽會，〔……〕就今日生產的日常手工藝品來看時，印度不用說，緬甸等國的生產品也有不少蘊含著英國人不可企及的藝術趣味。由此，對英國人統治印度這樣的文化古國到底是否合理一事也發生了疑問。<sup>5</sup>

與此〔依靠大量佔有殖民地和天然資源而富強的英美〕相比，日本可謂處於非常不幸的位置，缺乏天然資源，占有的殖民地也不值一提。必須單靠國際貿易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致富。盡管如此，我卻為這日本的貧瘠而禮贊。雖然今日在歐洲沒有可與英國之富強相比肩的，但倘若英國就此滅亡，那它到底為世界文化做出了何等程度的貢獻，究竟會留下些什麼呢？這是很值得質疑的。美國就更加不值一提了。<sup>6</sup>

3 有關「近代超克」論的文獻，可參見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收於家永三郎（編）《歷史的概觀》，《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廣松涉：《「近代の超克」論：昭和思想史への一視角》（東京：朝日出版社，1980年）；Ryoen Minamoto (源了圓), "The Symposium on 'Overcoming Modernity'," in James W. Heisig and John C. Maraldo (eds.) *Rude Awakenings: Zen, the Kyoto School,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Harry Harootunian, *Overcoming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近代による超克：戰間期日本の歴史・文化・共同體》，梅森直之（譯）（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2008年）等。

4 內藤湖南：〈民族の文化と文明とに就て〉，收於內藤乾吉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147。

5 前揭文，頁142。

6 前揭文，頁141。

要之，東洋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地的文化生活，在數千年前已經完成了從原始生活進入文明生活的過程，超越了所謂文明生活的利用厚生，較早地關注生活的趣味性及藝術性。不是滿足於征服天然，即利用高度發展的人工力量，而是進一步地將天然醇化，致力於保護和發展天然，最終目標是與人類所選擇的最好的天然同化並生活其中。如此的文化，是那些把利用厚生這一中間過程當作文化生活的主體，並以此為最佳的歐洲人尤其是美國人所無法想像的。<sup>7</sup>

如果說，內藤在一九二六年對英美的批判主要是在於文化論層面上的話，他在一九三一年的一次演說中對英美以及整個西方的批判更深入到文明論的層面，對構成近代西方文明之骨架的政治經濟組織的原理提出質疑。

大體說來，歐洲近代的政治經濟組織，以中世紀末期的新領土發現為其第一原因，〔漸次經由從新領土獲取天然產品、以殖民政策開發農業、販賣本國的工業產品和進行資本投入等階段，〕數百年間，在本國有人口增加、生產發達、資本增殖等不斷進步，而無停滯不前之現象。政治方面也隨之而把政權漸次從地主轉手與資本家以至勞動者，在發揮人的才能這一點上也無停滯不前之現象。而人們相互之間也形成了有進取心和才能者最能施展其力量的組織，並把由選舉產生代表者視為最高的政治組織。然而最近的社會狀態就連在殖

民地也漸漸現出窮途之勢，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那些由選舉造成的政治組織是否可算最善的組織實在很值得懷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在六七十年間經歷了與歐美同樣的過程，而現在的窮途之勢所帶來的弊害想必也是要同樣承受下去了。<sup>8</sup>

那麼，如何擺脫困境，形成新的治經濟組織的原理呢？內藤把目光投向東方，包括古代的印度和日本以及現代的滿洲，舉出以下三個例子。

第一，古代印度的佛教僧團「在內部採取了最為平和，不會引發競爭心的生活方式，對外則憑借各自的才能獲得國王和人民的信仰，使佛法得到推廣。這就說明，即使不採取選舉或者其他各種鼓舞競爭心的方法，人類也是可以達到進步的。」

第二，前近代的日本是憑氏神中心的村落組織而運轉的，「不依靠選舉或是其他各種競爭方式來開展行政，這種和平自治的形態在今天也相當值得參考。」

第三，從奉天城外清真寺的長老處得知「有一套針對穆罕默德教徒的交通組織」。即滿洲的回教徒不去使用現代的汽船，而是依靠各地回教村落的網絡，利用沿岸各地的木船，化費很長時間前往麥加朝聖。

7 前揭文，頁 151。

8 內藤湖南：〈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收於內藤乾吉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 6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2 年），頁 154-155。

「在信奉速度和力量的現代還有這種交通組織的存在，作為一種維護自己信仰的宗教和禮儀的方法，這是否對如今這個無視宗教無視道德，只朝功利的方向前進的時代，會帶來了一些教益」？<sup>9</sup>

內藤的這個題為「關於東方文化聯盟之鄙見」的演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內藤於大阪召開的東方文化聯盟成立大會上發表的，形式上是對流亡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李斯（Rash Bihari Bose）所作主題報告的評論。

其實，內藤並不是應邀來會上演說而已，他本人就是該聯盟的主要發起人和理事之一，聯盟的名稱是他所命名，聯盟的宗旨（加強亞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實現共存共榮）也得到他的修改潤色，刊登在每期聯盟機關刊物的扉頁上。所以，說他是這個組織的精神領袖，也決不過分。<sup>10</sup>

在上述演說中，內藤聯繫到李斯的主題報告「文明之母：亞細亞」，並重申他在〈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一文中的見解，指出：

即便憑我極少的經驗，也能列舉一二東方諸國諸民族的可取之處。除此以外，在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和風土民情中，應該還有更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所以，我們能夠感覺到東方文化聯盟這樣的組織並不是無意義的。我們以今日成立的文化聯盟的微薄之力為基礎，盼望

那些中了現代的社會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流毒，即所謂強國之國民做出最痛切的反省，為這個聯盟的前途而祝福。並且再次感謝李斯先生，用印度的文化帶給我們這樣一個反思的機會。<sup>11</sup>

如此看來，即使英國通過近代的科學及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壓迫、征服了印度，但是很顯然地卻無法征服其文化，無法征服文化便稱不上是真正的征服。所以可以斷言，一旦有機會，英國必然會失去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征服力量。李斯君懷有強烈的愛國心，宣導印度的獨立，在印度也有著許多與之共鳴的年輕人。我們堅信李斯君有一天終究會達成他的目標。<sup>12</sup>

這樣看來，內藤由於參與東方文化聯盟的籌建以及與李斯等印度獨立志士的接觸，確實在思想上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他對日本追隨西方，無視宗教無視道德，只朝功利的方向前進的近代化路線敲響警鐘，並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中了現代的社會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流毒的所謂強國之國民有必要作出反省。儘管他後來對滿洲國的建立發出歡呼，並對其建國方針提出建議，他這一段的思想言論仍不失其重要性，而且他的一些建議，比如不要把日本的地方選舉制度移植到滿洲國，以便防止在地方自發的自治組織以外又形成一套地方議會，從而對人民造成雙重負擔，正是建立在這一段思想基礎之上的。<sup>13</sup>

9 前揭文，頁 156-158。

10 關於東方文化聯盟形成的動因、過程和活動的詳情，參見陶德民：〈內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3（2008 年 12 月）。

11 內藤湖南：〈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頁 158。

12 前揭文，頁 154。

13 參見陶德民：〈「近代」への執着と反省——内藤湖南の中国観の射程〉，《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澤・天因・湖南の外交論策》（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 年）。



所以，雖然內藤當時並沒有使用「近代超克」的字眼，他的以上思想和主張都是著眼於克服近代文明所帶來的弊病的。因此，不妨稱之為昭和初期的「近代超克」論。

內藤的「近代超克」論不僅包括對日本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出反省的因素（雖然還嫌流於抽象），而且至少還對印度的獨立運動予以了同情和支持。與此相比，正如子安宣邦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昭和第二個十年即戰時的「近代超克」論者雖然猛烈地抨擊英美，卻對日本正在對中國進行的大規模侵略戰爭隻字不提，置若罔聞，因而難以避免人們對其立論的唯我獨善之性格的指責。<sup>14</sup>

14 參見子安宣邦：〈中国の戦争の事実に誰が正面したか——座談会「大陸政策十年の検討」〉（第四章）、〈宣戦になぜかくも感動したのか——「支那事变」と「大東亜戦争」との間〉（第七章），《「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



【多元觀點】

## 有關臺灣和日本的海洋性之空間心性 與政策的地勢意義<sup>+</sup>

山室信一<sup>\*</sup>  
田世民<sup>\*\*</sup>譯

### 島國、海國及海洋國家

「島國」一語在日本具有封閉的意涵，「海洋國家」則具有較為開放的涵義；至於「海國」則是到了幕末始興起的概念。海洋具有「封閉」和「聯繫」兩大功能，亦即海洋同時具有「隔離作用」和「結合作用」。這兩大作用亦受到一九四〇年代興起的海洋地緣政治學等相關學問研究的強調。

一五四七年足利幕府送出最後一批勘合貿易船，此後迄一八七一年之三百年間與中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相對地，一三七二年至一八七二年這五百

年間琉球接受明清兩朝的冊封，與日本之間也保持著密切的交流。由這兩個年代可以看出中日之間，透過琉球、以及三者之間的海域，持續維持著一個聯繫的關係。日本於江戶時代雖然施行「鎖國」體制，但仍透過對馬、琉球、長崎及松前（山丹）等四個海口與朝鮮、中國、荷蘭以及愛奴之間維持著一定「通信」或「通商」的關係。

幕末，由於列強的逼近使得海洋對日本成為一種威脅。如林子平在《海國兵談》（1786年）中提出著名的海防論，指出海洋的無遠弗屆，以及武力軍備對於「海國」日本的重要性。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一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sup>\*</sup>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sup>\*\*</sup>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此外，薩摩藩主島津齊彬早於一八五七年即有於臺灣設立港灣以利進出中國，甚至將槍砲等武器銷往中國的構想，然此構想因齊彬的早逝而頓挫。這個事實顯示日本於明治初期的一八七四年出兵臺灣並非一項唐突之舉。

## 民眾文化的空間心性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於史無據的神功皇后傳說。《日本書紀》記載：「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乎」，並指出神功皇后征伐三韓，且三韓因日本為「神國」而自願臣服於日本。再者，《八幡愚童訓》裡也記載：「新羅國之大王者日本之犬也。」

再者，民間如祇園祭裡有象徵神功皇后征伐三韓時使用且流傳至今的祭神彩車（占出山鉾、船鉾）等，仍有將朝鮮視為日本的奴隸的意識存在。

此外，在學問方面，國學者本居宣長也在《馭戎概言》裡提到，朝鮮與琉球一樣皆為日本的奴隸，而對日本侵略朝鮮加以合理化。而且，小學的教科書裡面也都收錄了神功皇后征伐朝鮮的傳說。這些都顯示神功皇后的傳說造成日本人的心性裡對朝鮮具有強烈的蔑視觀。

在臺灣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鄭成功的傳說。鄭成功死後約一世紀近松門左衛門完成了《國性爺合戰》（1715年）這個淨瑠璃的作品。該作問世後轟動一時，持續在大坂上演了近三年的時間。以「和藤內」（雙關語，義指既非日本亦非唐）為主人公的《國性爺合戰》既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充滿了對異族鞭鞭（滿清）的蔑視。

再者，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臺灣之際，也

再次追憶起鄭成功力抗清朝、海外雄飛，佔領臺灣的事蹟，藉此合理化武力侵台的行徑。甲午戰後，迴繞對鄭成功的評價也再度浮現，丸山正彥《台灣開創・鄭成功》（1895年）等描寫鄭成功與日本同仇敵愾、對抗清朝之類的論述成為評價鄭成功的基調。

此外，日本佔領臺灣以後，還特別將臺灣的延平郡王祠直接改定為「縣社開山神社」。不僅如此，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總督府再次利用鄭成功這個主題，而催生了長谷川伸《國性爺——飛黃大船主》（1942年）等小說。戲劇和小學的唱歌裡也都可以找得到有關國性爺、或是海民意識的影子。

## 近代日本的地勢構想

除了以上所舉的空間心性以外，還需檢討近代日本對於地勢的構想以及相關的知識來源。日本為了出兵臺灣以遂行南進政策，在英國海軍提供資料之下由陸海軍繪製了完整的海路圖。

在學問方面，美國的馬漢（Alfred T. Mahan）注意到了「海上權力」（sea power）的意義，撰就了《海上權力史論》一書。曾任第一代泰國公使的稻垣滿次郎提出了鐵道、海運結合論，將日本視為連結全世界的空間軸的「中點」，並參與東邦協會，進行東洋諸邦及南洋諸島的調查。

松方正義也著眼臺灣的地理重要性，視臺灣為「北守南進策之第一著根據地」。一九一九年臺灣總督府進行官制改正，將臺灣軍由防禦部隊的功能轉換為進攻部隊。並且，於一九二二年的「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中，視美國為假想敵，將臺灣軍從防禦部隊的功能轉換

為攻略呂宋島的進攻部隊。在學術領域方面，曾任臺北帝大校長的幣原坦也強調在臺灣研究南洋的學術價值。

另外，著有《大日本》《太平洋地政學》等代表作的豪斯霍弗爾（Karl E. Haushofer）將印度洋、太平洋視為同一空間的海洋地政學、生存圈（Lebens Raum）等主張，給予積極向外擴張的日本極大啟發。

### 政策資源及作為政策對象的海洋

戰後，前此視海洋為共有物或無主物的兩個海洋觀逐漸瓦解，領海範圍的界定亦由原本的三海浬逐漸擴大至二百海浬，將海洋當作資源加以利用的趨勢已然形成。

日本至六〇年代為止，鮮少提起與海洋國家有關的主張，在海洋政策方面處於空白的狀態。其後始有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構想」等政策。二〇〇五年七月，為了綜合掌握包含陸域和海域的國土空間，日本政府制定了國土形成計畫法，至此海域和沿岸水域始成為國土計畫的對象。二〇〇六年，國土交通省擬定「海洋沿岸政策大綱」，終於朝將海洋作為國土並綜合管理的方向駛動。

中國和韓國也先後制定海域使用的相關法規，並設置主管機關。海洋當中富含礦物、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對於應該如何進一步思考和探究海洋資源的可能性將是未來一大重要課題。以往學界大多以時間的課題或陸地上的課題為主軸來進行研究，今後將有必要以空間、且以充滿可能性的海洋為主軸來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多元觀點】

## 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Thinking about Humanities and the Arts<sup>+</sup>

Ann Waltner<sup>\*</sup>

Connections among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in many ways, but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value of face-to-face contact and conversation as ways for making connections.

Today I am speaking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umanities institutes and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 I will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I see, the possibilities I see, and make some suggestions as to ways I think we might be able to take better advantage of the possibilities. I will begin by saying I am speaking very much out of my own experience a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about our experiences in running a two-year symposium on the topic of "Body & Knowing." The last time I spoke to this group, I talked about our last symposium, which was on the topic of "Time." I

suggested during that talk that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od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humanists around the question of time might well be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arts. I talked a bit about a dance project entitled "Wreck" The dance was choreographed by Carl Flink, a member of our dance faculty. We held a series of seven open rehearsals in which people who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e "Time" symposium responded to a work in project focusing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y saw time as a theme in the dance. I'll show you a brief clip which will give you some sense of what the dance was about.<sup>1</sup> The clip demonstrates something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stillness and motion that is central to the way the piece thinks about time. I am happy to talk about that project in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Let me backtrack a little and tell you about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專題演講內容。

<sup>\*</sup>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up>1</sup> <http://www.startribune.com/video/13715197.html>.

my institute itself. It is new: we are in our fourth year of operation. I am the first director. We offer residential fellowships for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the faculty fellowships are a semester long. The graduate fellowships are year-long. We also have funding from the Mellon foundation to bring in scholars who are working on projects which are of interes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some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some for as long as a semester. We are genuine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our mission is to serve faculty at all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ampuses. This is the breakdown of fellows over the pas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rts	9
humanities	24
social science	26
science	1
education	3
law	1
business	1
design	1
total	66

Our program of fellows is residential—that is to say, they move their offices into our space and are expected to spend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ime in the offic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ommunity building, all fellows (a cohort of about a dozen people each semester) come to lunch on Tuesday—one fellow makes a presentation each week on his or her project. The lunchtime discussions of work in progress are really critical to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and to produce a sense of intellectual community which crosse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some of the issues which face institutes like mine in incorporating artists into the community are

similar to those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integrate lab scientists. The humanities institute model is in some senses designed for people whose work involves reading and writing—we provide desks and bookshelves and chairs and computers. We do not provide labs or studios. If someone has a well equipped video studio or biology lab, we do not duplicate that. (We did provide a painter with studio space—our building is an old dorm, and there are sinks in many of the rooms—indeed some of them have bathrooms attached with antiquated bathtubs and toilets. The painter came from one of the coordinate campuses. He asked if we could provide him with a studio, and when I asked him what he needed, he said running water and natural light. We found a corner office for him, and it worked beautifully. We had other visual artists who continued to work in the studios provided by their home departments—some of whom becam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life of the institute, and others less so.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while the problem of physical proximity is a real problem, it can be solved. An artist or a scientist who is based in another building can make a commitment to show up for lunches and events and b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I think though tha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problem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more particularly, and that is an epistemological problem—a problem in how we view knowledge as being constituted. I do not mean to suggest that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do not appreciate the arts—indeed, one of the key subjects which humanists study is the arts. Many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not only study the arts, they attend arts events for pleasure. Others are benefactors of the arts. So why am I talking as if there is a problem? If I am to worry about fissures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my institute, why do I



not talk about fissures betwee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on one sid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s on the other — or, even more starkly,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physical scientists, or even between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on the other. All of those are fissures that are worth talking about, but I only have 30 minutes today. And I think the fissure betwee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t least in part because it is rather surprising. What do I mean when I say there is a fissure between, for example, people who study theater and people who teach acting?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the problem, but it does seem to me that both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t least, as well as in our intellectual practices, there is a division between historians, critics, and theorists of the arts on the one hand (though placing all of those people on one hand brings its own share of analytical problem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s on the other. I would say that this particular fissure has deep roots in questions of how meaning is constructed and very particular views about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the nature of performance, and in how scholars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Let me illustrate with an anecdote—earlier this fall, the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 met at St. Olaf and Carleton colleges, not very far from Minneapolis. While the conference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Asia, there are also scholars study Asian-Americans. An important Japanese-American dance group, called Eiko and Koma, was performing in Minneapolis during the conference. We arranged special group rates, organized a bus to take conferees from the conference venue to the performance and back, and organized a talk-back after the show which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at som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ere academics who studied Asia. A few days before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er let me

know that no one had signed up for the bus, so he cancelled the bus. No one from the conference but me showed up. (The performance hall was full of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 are probably several reasons that people chose not to come—it would have been a 40 minute bus ride, people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with their friends at conferences, and so on, but I think the chief reason was that people did not see that there might be a connection between what Eiko and Koma were doing in their dance and their own scholarship. They did not think that watching a dance performance (and listening to a discussion of it afterwards with the performers) might make them better scholars—they were not open to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y might gain insights from a performance in a non-verbal medium that were of a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sort than insights conveyed in words. They did not see the possibility that dance might produce knowledge, and that attention to the dance might indeed be a part of the work of the conference. This is what I mean when I talk about a fissure betwee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There are other ways we can see this—for example, why don't we ask (on a regular basis) people like lighting designers to come to literature classes to come and talk about how they see meaning in performance. We know, when we stop and think about it, that lighting directors generate meaning, not in the same way as actors and directors generate meaning, but they generate it nonetheless. The way light and dark play upon a scene quite literally affect the way we see the scene—those choices may be made by the director, or they may be made by the lighting designer, but they are implemented by the person manipulating the switches (or computer panels) which control the lights. That person is creating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ene, a different kind of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an that which is

made by those of us who work with words.

We could ask lighting designers and dancers to come to literature classes and talk to students (or come to symposia and talk to scholars) about what they do and how they see it; indeed, as you shall see shortly,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trying to do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ut as soon as we do that, one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comes clear—when we ask the lighting designer or the dancer to come and talk about their work, we are going asking that person to use words to describe their work and creative activity which is based in a non-verbal medium. This sounds commonsensical, and obvious, and maybe even unproblematic. But I submit that it is problematic. (Just as an aside here—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gone a long way toward de-cente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d, though perhaps in a way that makes thinking more disembodied. At any rate, digital embodi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fashioned kind, and is something that our "Body & Knowing" group is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Indulge me in another anecdote, also featuring Eiko. One of the ways I generate ideas for events for the symposium (which is, as I indicated earlier, on the topic of "Body & Knowing") is to send out broad invitations to lunches — anyone in the University or broader community who sees a flyer or who is on our listserv is invited to come to a lunch to talk about how their work relates to the topic of "Body & Knowing." Those lunches are a great deal of fun—they promote discussion across disciplinary lines, which is one of our key missions. People who come to the lunches (myself included) always end up meeting new people who share interests. At the end of one of these lunches, Eiko said that the conversation had been extremely interesting, but w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embodiment in a rather disembodied way and that it would very interesting thing to have a

movement workshop as part of a planning session. She looked around the room and said "I could do a movement workshop in this room." So we scheduled a movement workshop for the very next week, and about 20 people from the planning workshop came. IMAGE We have since had several other workshops with movement artists in whic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university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se are small steps; the English word remains the major medium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t least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ose who work in other media often feel as if they are on the fringes of the academy, as if they are there for pleasure or entertainment, but that what they do is not essential. Psychology and brain science are beginning to show us in very clear ways how knowledge is embodied; yet our everyday practices of scholarship do not always reflect this.

I'd like to take a couple of moments now to show you another result of the Time symposium--some clips from a video made by a video artist named Lynn Lukkas. Lukkas is an artist who works in the medium of video—she conducted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and artists on the subject of time. At the IAS we now document almost everything that we do — we have an undergraduate with a camera who records things and puts them up on our website (our video page is at <http://www.ias.umn.edu/media/Media.php>). But what Lukkas has done is to take the interviews and edit them together to make an artistic statement about time. I'll show you some clips to suggest what some of the payoffs for this kind of work are.

Both of these clips—the Wreck clip and the Lukkas clip — suggest, I think — a subtle yet logical movement in the progression of the symposium topic. Contempla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ime led to contempla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embodiment, and in fact Lukkas and

Flink were two of the board members who were central to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Symposium topic of "Body & Knowing." These two examples have suggested that exploring more full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questions we as humanities institutes are asking and the artistic work some of our colleagues are doing would be productive.

What are we doing to further these explorations? We are at a fortunate confluence of ev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 renovation of a large building which holds the Northrop Auditorium (IMAGE). It is the iconic building which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campus; it is where graduations are held; it is where Bob Dylan played on election night this year. The auditorium is large and cavernous—it seats 4800 people, which means that only graduation ceremonies and Bob Dylan concerts can fill it. The renovation will make the size of the auditorium smaller—a smaller hall has better acoustics. There will be 35,000 square feet of non-auditorium space in the building, and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nd the undergraduate honors program will move into the building. Thus, what we imagine is a site, at the center of campus, where the premi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the iconic performing space, and lively undergraduates in one central space. We are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of working with architects about the details of the design (and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slow down the project). But we imagine that the synergies possible from this will be important in helping us reimagine what it is we do and how we talk about what we mean by research, which is, it seems to me, a critical issue of this moment. It irritates me when people say crises are opportunities but it does seem to me that one of the messag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at business as usual is no longer a supportable mode of operation for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ay mean that that is true world wide, though I suspect that our North American modes of operation are the least supportable of all). If we do not reimagine ourselves, people whose aims differ from ours may well do it—and they may well narrowly focus on the bottom line of costs to the detriment of expanding our collective creative potential.

In the renovated building we will have shared public spaces; we will be in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We will have a shared café. We are beginning to plan programming which will integrate the performers who come into the large spaces with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 programming, and with honors programming—longer term residencies, master classes, and so on. We will design spaces to be collaborative, and some of those spaces will be collaborative in ways that are friendly to movement artists (sprung floors, high ceilings). We want to render the processes of art-making visible—including the messy parts, perhaps even especially the messy part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re will be synergies—we are not sure what kinds of synergies—to paraphrase a comment I heard at a conference last week, if we knew what we were going to find we would not call it research. The synergies will be among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honors students, and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d like to quote from a grant proposal we submitted which explains (in what is perhaps grant-proposal hyperbolic language) one of the ways we see synergies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research operating.

Foster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research centers and arts programs, this project embraces several goals. We intend for the process to foster experimentation with a wide range of formats for connecting creative and scholarly research:

lectures, symposia, workshops in which the "audience" moves / writes / draws / sings / stands on its head, and participates in new formats not yet conceived. Last year's work by the IAS demonstrates one means by which this can happen. By making artists' methodologies more transparent to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and engaging artists and scholars in focused dialogue related to the creative research process, the IAS has demonstrated its commitment to actively promoting artists' methodologies as essential to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t has also provided an effective means of doing so. [.....]

[.....]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 of this model for the evolving field of twenty-first-century dance practice, however, centers on its capacity to elevate movement artists as investigators to an equal level with others in the academy and to foster conversations about processes of research and creativity. Our method of foregrounding creative movement research within the agenda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s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peers to witn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component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We hope you feel as we do, that the "Circulating Creative Research" project has enormous potential for expanding the academy's conceptualization of research.

We did not in fact receive the grant that we applied for, but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project and will continue our explorations.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building will solve all of the issues for this; but the building will help. Buildings do not make things happen, but they

create spaces where things can happen. A building which is friendly to collaboration and casual conversation, which has pleasant common rooms and good food service will serve as a magnet to a diverse group of people. And the common explorations of that diverse group of people will perhaps work to expand a bit the boundaries of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about research and knowledg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e hope that these explorations will help us chart our way through what promises to be an uncertain future, us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at we have only begun to imagine, to a new and different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s and the research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 【計畫近況】

#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黃俊傑<sup>\*</sup>

### 總計畫

本計畫建立在自 1998 年以來各階段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以東亞為研究之視野，以經典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既宏觀東西文化交流，又聚焦東亞各地文化之互動，並在上述脈絡中探討經典與價值理念之變遷及其展望。本計畫擬為漢語學術界開拓東亞儒學研究新視野，積極開拓「以東亞為研究視野」之儒學研究，並從東亞出發思考，以探索其中的同調與異趣；更聚焦於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傳統，提出創新議題。本計畫希望在廿一世紀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深入發掘東亞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上推陳出新，開創新局。

### 分項計畫

#### 東亞儒學視域中的朝鮮《論語》學（II）

本研究首要目標，即在於徹底釐清朝鮮時代六百年間朝鮮儒者《論語》學之重要內容及其思想傾向，尤其集中在韓儒釋《論》時對朱子學之因襲與創新，從而有助於對朝鮮朱子學之瞭解。

#### 東亞儒耶交流中的經典與人物

本研究以日本、韓國及中國三地共通、且在當時即具影響力的儒耶交流典籍為切入點，以東亞三地與天主教有接觸的儒學家為對象而進行分析研究，亦比較其思想與日韓相通與異同之處。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四大創始計畫之一，第一階段已於今年七月卅一日執行完畢，並於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第二階段。

<sup>\*</sup>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從韓國的三禮著作 探討韓國對華夏禮儀的融合與轉化

本研究依華夏古禮，將禮儀分為私禮、官禮兩部分，重視韓國學者對華夏禮儀特別重視或予以批評修改之處，並以韓國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去了解其重視或批評的原因，以突顯其融合與轉化的痕跡。

### 朝鮮後期的「四端七情」之辯（II）

「四端七情之辯」是朝鮮儒學史中最重要的一場辯論。本研究將探討丁時翰（1625-1707）、李玄逸（1627-1704）與鄭齊斗（1649-1737）的「四端七情之辯」觀點；並另研究五位朝鮮儒學的代表人物。

### 東亞《論語》學中的音樂美學

本研究以《論語》為研究的經典，選取中日韓學者對《論語》中有關音樂的相關篇章的注釋作為分析對象；並嘗試從中日韓學者的各種見解中找尋屬於東方美學的共性。

### 古代東亞的「周禮國家」：儒教與王權之研究

古代皇帝制度的政體形態可稱為「周禮國家」。本研究擬從《周禮》一書的詮釋與運用出發，說明其中以農業王權為主軸的相關學說如何成為中國皇帝制度的信念。

### 七、東亞儒學視域中朝鮮丁若鏞之經學

本研究將針對丁若鏞關於經學的著作，進行全面縱觀和微觀的探討，並探討三者：一、其與日本古學派的關係；二、其與西學的關係；及三、其與中國經學家的異同。

### 計畫執行近況

九月十九至廿六日，本計畫特別蒐集存世的王陽明與陽明學者墨跡，於學習院大學舉辦「陽明學與東亞學術特別展覽會」。

九月廿日，為紀念王陽明龍場悟道五百周

年及中江藤樹誕生四百週年，本計畫與日本學習院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與韓國成均館大學，於東京合辦「東亞的陽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本計畫與本院合辦之「儒學討論會」，本季共舉辦四場：

###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怎麼顯現的？

時間：十月八日

主講：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荀子心與道的關係片論

時間：十月十五日

主講：林宏星（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

### 論語外傳——對孔門師弟傳說的思想史考察

時間：十一月廿六日

主講：陳少明（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 郭店竹簡《五行》篇與子思思想研究

時間：十一月廿六日

主講：陳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 【計畫近況】

#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胡佛<sup>\*</sup>、朱雲漢<sup>\*\*</sup>

### 總計畫

本計畫於二〇〇三年與「南亞民主動態調查」研究計畫合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團隊，共同組織涵蓋全球超過二十億人口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本計畫以「民主、治理與發展」為研究主題，已陸續進行了兩波調查研究，分別完成八國與十三國的面訪；並於二〇〇九年底開始進行第三波調查：臺灣區計畫定於二〇一〇年春天開始進行，大陸區計畫則於二〇一〇年下半年開始進行。

本計畫的研究目標，在於將東亞民主化經驗，納入全球民主化研究的主流，並協同其他區域研究，建構一全球性的民主化調查網絡。

### 分項計畫

####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區域調查計畫

本研究提供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總部的運作及作為全球民主動態調查區域夥伴的角色，主要任務在於設計第三波區域調查的核心問卷、協調前測和跨國調查時程以及亞洲調查團隊與其他區域調查團隊的研究活動。

####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

本研究之調查主題，依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共同問卷，再結合若干臺灣特殊的題目而成。本研究探討臺灣、香港及中國大陸三角關係中，傳統中國社會裡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比較性研究。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四大創始計畫之一，第一階段已於今年七月卅一日執行完畢，並於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第二階段。

<sup>\*</sup>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sup>\*\*</sup>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大陸地區調查計畫

本研究定於二〇一〇年下半年開始進行調查，發展跨國研究的細部分析架構、共同問卷與總體層次資料計劃；並配合跨國協調會議，確定資料登錄規範，以及確認資料集中存放規範。

## 調查方法與資料庫計畫

本研究依據原始的理論構想，應用心理測量技術以更符合問卷核心構想，提供各調查抽樣設計和調查方法論上的協助，並在資料蒐集完成後進行資料清理；建立整合性的資料庫。藉由資料庫網站建構，作為資料釋出與使用之公開管道。

## 計畫執行近況

本計畫的執行著重在跨國的調查，因此於每年或調查完成年度，都會邀請各國調查團隊舉辦例行工作會議與成果會議，不僅有助於調查計畫的持續進行外，更提供了國際學術間民主意見交流的平台。

六月廿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團隊，於臺北舉行了第二波調查成果的發表會暨「亞洲國家的民主治理現況」國際學術研討會，針對亞洲各國民主的現況發展，提出了最新的觀點。會中，本計畫特別邀請到長期研究國際民主化問題的 Larry Diamond 教授與會交流，並與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及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合作，邀請到美國、法國、馬來西亞、印尼、蒙古等駐台代表或使節與會出席。

六月廿二日，本計畫舉辦「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規劃會議」（Asian Barometer Writing Workshop），針對前兩波民主調查之結果，提出問題及改善之道，以做為未來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改革的依據。

八月廿九日，本計畫與「非洲民主動態調查」、「拉美民主動態調查」及「阿拉伯民主動態調查」等三個大型區域調查計畫，於美國波士頓進行「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s）會議，共同規劃未來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發展。

十二月十三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團隊於臺北再度舉行「工作規劃會議」，討論三項議題：一、進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問卷的討論，以便明年底能順利開啟第三波調查的進行；二、針對本計畫編排中之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sia* 一書，與各國團隊交換意見；三、針對亞洲民主動態各國調查的團隊，建立更明確的分工機制，並討論東南亞團隊未來出版著作相關事宜。

在出版品部份，本計畫於已於今年下半年度陸續出版二本重要的整合性著作：*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與 *Party Politics in East Asia: Citizens,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就歷史、理論性的觀點探討整體亞洲國家的民主治理，進一步在實務上根據調查後的經驗性資料分析，提供東亞民主發展的整體性觀點。

此外，本計畫更將於十二月底或明年一月初，出版第三本專書：*Why Asians Support Democracy and Why Not*，期望為未來東亞民主的研究，提供更多跨國整合的觀點。



## 【計畫近況】

#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鄭伯堦\*、劉錦添\*\*

### 總計畫

本計畫以極具獨特性之臺灣與華人社會為焦點，探討臺灣與華人社會在此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與因應。本計畫一方面掌握臺灣經驗的特色，一方面觀察其受衝擊後的變遷歷程，針對臺灣與全球化發展的關聯性，以臺灣商品、資金、人員及生產流動為主要的面向，討論臺灣與華人企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華人企業全球分工的位置、企業組織結構；華人企業在全球化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組織管理行為；臺灣總體經濟、金融及勞動等相關市場所受到的衝擊，以及地理空間的變遷等等。透過這些研究議題，本計畫將進行基礎理論與科際整合導向的跨國性、長期性研究，並與現行之重要文獻與理論進行對話。

### 分項計畫

#### 經濟全球化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經濟全球化所帶來對貿易、勞動市場、資本移動的衝擊，並研究總體政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將以臺灣經驗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所探討的是全球性的議題。研究的範圍以九〇年代以後的發展為研究的重點。

#### 全球化與區域變遷：東亞國家的比較研究

本研究嘗試透過比較研究脈絡，從全球城市發展、區域發展、及土地利用變遷等三個層面，以探究東亞地區的區域變遷特性，以瞭解第一輪亞洲新興工業經濟國，在新的全球化趨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四大創始計畫之一，第一階段已於今年七月卅一日執行完畢，並於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第二階段。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勢下所經歷的快速與劇烈的產業、政治與空間轉型。

全球化下的華人組織行為：關係主義有未來嗎？

本研究將探討下列主題：一、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華人企業組織行為如何因應時代而變遷？二、隨著全球產業分工與多國企業的興起，華人企業如何在全球各地有效運用華人企業組織文化、組織管理、以及組織領導的各項優勢，將企業組織行為進行跨國類推？

### 計畫執行近況

為了拓展全球化研究的國際視野，九月十九、廿日，本計畫假本校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舉辦「全球生產網路區域化與華人經濟圈經濟暨社會再結構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全球化與華人經濟圈等問題，就「勞動力與生產網絡」、「社會網絡與發展、生產網絡」及「生產網絡、研發與工業升級」三大議題發表研究論文及討論未來研究方向。本次研討會為每年一度「全球化研究」系列國際研討會的第二次研討會，共發表了十二篇相關論文，並進行了二場主題演講；明年度之「全球化研究」國際研討會，將與本計畫「九十七學年度成果發表會」結合，擴大辦理。

本計畫主辦之全球化計畫系列討論會，本季共舉辦二場：

**The Boom-Bust of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and Its Impacts: What's Old and What's New?**

時間：十一月三日

主講：陳南光（本校經濟學系教授）

**The Contradictory Dynamics of Flexibil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Taiwanese Hosiery Industrial District**

時間：十二月一日

主講：徐進鈺（本校地理學系教授）

## 【計畫近況】

# 東亞法治之形成及發展：對東亞法治理論、 體制與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蔡明誠<sup>\*</sup>

## 總計畫

本計畫延續「東亞法治之形成」計畫之研究議題及方法，為展望東亞法治之理論、體制及實踐之變遷，加入東亞法治之發展，作為研究對象，以時間之動態觀察，比較分析東亞法治之形成、發展過程及實踐成果。

以東亞及區域性國際脈絡之「人權」、「憲政」、「多元文化」與「社會發展」為核心，有如屋宇之四柱，以作為法治國之基礎，並以下列三種作為接下來東亞法治整合研究之議題：一、東亞憲政體制與法治原則發展；二、東亞及區域性國際脈絡下「人權」與法治發展；三、亞洲多元文化下法治原則之反思及實踐。

## 分項計畫

總統選制、分裂社會與憲法法院：  
臺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

本研究將透過臺灣與南韓的比較，探究亞洲的總統體制對分裂社會形成的作用，並透過憲法裁判的比較分析，探討亞洲的憲法法院如何因應基於憲政體制設計所造成的社會分裂。

法規範性與合法性：  
對臺灣／東亞法治經驗之理論反省

本研究之主題脈絡有二：一、由法概念論的「法律是什麼？」的問題意識，發展為什麼是法的規範性；二、法規範性問題在臺灣／東亞的具體歷史經驗脈絡下的意義是什麼。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四大創始計畫之一，第一階段已於今年七月卅一日執行完畢，並於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第二階段。

<sup>\*</sup>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兼本校法律學院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區域性國際刑事人權基準之形成：  
歐洲經驗與東亞發展

本研究以區域性國際刑事人權基準的發展為研究範圍，從歐洲經驗出發，進而檢討東亞發展的條件，將有助發展出「普世價值之刑事基本人權」及「刑事被告權利清單」。

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對話：東亞脈絡的考察

近年各國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在解釋憲法時，常有援引或參考國際人權條約或國際人權法院判例之趨勢。本研究希望藉此研究作為探詢東亞區域人權標準或機制的起點。

法治原則與臺灣原住民族之保障

以法治原則保障原住民族的利益，已是當今國內與國際上的主流。本研究擬探討如何藉由包含著自治權、土地權等內涵的法律，以及法治原則，確保原住民族的生存與發展。

反抗「欠缺作為傳統」：  
東亞法治論述的後殖民女性主義反思

本研究試圖透過後殖民女性主義批評，探討「法治之欠缺」如何被論述性地建構為東亞傳統，以及東亞女性如何被雙重地他者化；以探討抵抗西方法律霸權「法治」論述之可能性。

計畫執行近況

本計畫主辦之「東亞法治及人權講座系列」系列講座，本季共舉辦五場：

Asian Co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比較觀點下的亞洲憲法

時間：十月九日

主講：Cheryl Saunders

（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教授）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Courts:  
Is There a Problem?

比較法作為憲法解釋的方法？

時間：十月十日

主講：Cheryl Saunders

（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教授）

法治國原則在日本的繼受

時間：十月卅日

主講：長谷部恭男（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

法治國及其困境

時間：十月卅一日

主講：長谷部恭男（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

東亞法治之法學研究議題及方法：

以「人法」與權利歸屬論為例法治國及其困境

時間：十二月一日

主講：蔡明誠教授（本校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 【計畫近況】

# 華人的觀與我觀： 跨學科及跨文化研究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楊國樞\*、黃樹民\*\*

### 總計畫

本計畫將從人文學、社會科學、心理學與生物醫學等四種視角，以跨學科及跨文化的研究方式，探討華人的觀與我觀。本計畫之總計畫從事有關人觀與我觀之研究結果的跨學門比較，至於人觀與我觀的跨文化比較，則由各學門之分項計畫分別從事之。

### 分項計畫

#### 先秦儒家的人觀與我觀

本研究檢討古代血緣社會結構的親屬關係，如何獲致社會結構認同的個人形象，進而瞭解儒家如何將分化於渾然整全之道的人，形構其天人合一下的自我形象。

#### 明儒的人觀與我觀：王陽明與陽明學派

本研究以王陽明的我觀為主軸，檢視文本中有關心、知、意、物四項自我概念或理念，企圖分析出陽明學派如何影響明代晚期士人理念的我觀及人觀模式。

#### 禪學的人觀

本研究將提供禪學多元的人觀思考，開發切合現代生命的禪學研究議題；更者，本研究期望能進一步培養禪學人才，為國內佛學文獻典藏添增研究成果。

#### 道家之人觀與我觀

透過研究莊子與老子思想，本研究擬探索跨學科對人的無限性、人的存在特性與諸向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第二階段新計畫之一，於今年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

\*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度、夢、物的本質、意識層次、意義治療等問題，並期釐定先秦道家系譜。

## 基督教之人觀與我觀：全球地域化潮流中基督宗教人觀與我觀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本研究集中於四個主題：一、人是什麼的基本認識；二、探討人性的陰暗面與幽暗意識；三、追問人的位格價值核心；四、關注人在時空處境下的存在。

## 中國近代思想中文化多元論者的人觀與我觀

本研究擬比較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三位文化多元論者：章太炎、陳寅恪與錢鍾書，希望能以此對建構整個華人社會的人觀與我觀，提供系統知識，有所貢獻。

## 華人社會中的人觀與中庸思維

本研究討論科學哲學中的人觀及其對建構科學微世界的影響，並通過回顧儒家中庸修養思想，進而重新編製「中庸修養量表」，以針對新問題進行實徵研究。

## 社會學中的人觀

本研究擬分析西方社會學「文化內研究」人觀，並就「文化間研究」人觀進行相對系統化解讀，嘗試於西方社會學與中華文化的人觀間，找到相互參照的可能。

## 人類學中的人觀

本研究探究社會角色與個體自我之二元人觀，何以建構現代西方道德優越性及理想政治體制；並分析儒家尚賢理論如何利用二元人觀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

## 人觀的人性基礎與發展歷程：心理學的觀點

通過訪談、記憶測驗、文本描述、實驗等研究法，本研究檢驗關於人類演化偏向與形塑人觀之相關假說，以為原初「人觀」及其發展方向做出拼圖。

## 華人之雙文化的人觀與我觀：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觀點

本研究從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進行分析，研究現代華人雙文化之我觀如何在不同文化傳統下形成；並探究不同文化系統之我觀如何共存與運作。

## 生物學的人觀與我觀

本研究擬進行生物學思想中的人觀與我觀概念分析研究，探討人觀與我觀概念在演化理論、人類學理論與人性觀的見解，並釐清其哲學意義與反思。

## 【計畫近況】

# 生產力與效率研究總計畫： 從東亞邁向全球化研究計畫<sup>+</sup>

計畫總主持人：  
黃鴻<sup>\*</sup>、傅祖壇<sup>\*\*</sup>、王泓仁<sup>\*\*\*</sup>

### 總計畫

本計畫的研究目標，在於整合本校與國內生產力研究上之研究人力與資源，推動重要且創新性之整合型生產力研究計畫，提升國內生產力研究之品質。

### 分項計畫

#### 銀行產業的生產力與效率

本研究分析全球四十三國銀行的生產力和營運效率，以判斷銀行民營化是否有增進生產力和效率的效果，進而分析國有和民營銀行生產力差別的原因。

#### 運用參數與半參數估計東歐各國銀行業技術與配置效率

本研究擬探討「技術無效率」與「配置無

效率」對轉型中國家銀行業之影響，進而分析不同所有權形式對於東歐國家銀行成本效率之影響。

#### 會計師事務所的生產力增長

本研究擬分析會計師事務所的生產力變動因子；另外本研究亦探討業務比重日益增加的非審計服務，其對於會計師事務所生產力增長及其組成分子之影響。

#### 生產力與盈餘管理

本研究將透過生產力分解，以分析生產力成長的各因子如何影響經理人員之盈餘管理行為，並探討人力資本如何影響生產力及盈餘管理間的關係。

<sup>+</sup> 本計畫為本院第二階段新計畫之一，於今年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

<sup>\*</sup>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

<sup>\*\*</sup>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合聘教授。

<sup>\*\*\*</sup>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 臺灣高等教育之生產力與效率評估

本研究將以學生為本位，針對大專院校與技職院校之商學院進行績效評估，並評估校際之表現差異；進而分析效率為純學校效果或學生差異效果。

### 服務創新與組織績效：社會互動觀點

本研究欲透過社會互動觀點，來探討服務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關係，並針對半導體產業進行個案研究；進而歸納出影響服務創新績效的主要因素。

### 事業網絡、知識管理能力與創新績效： 社會網絡觀點

本研究欲透過網絡觀點來探討組織間網絡如何透過知識管理來提升其創新績效，並將討論所提出研究架構及命題之研究貢獻及相關之管理意涵。

### 服務品質到服務滿意度：信任與公平觀點

本研究擬探討影響顧客對服務品質感受的因子，並發展以信任與價值為中心的服務評價機制；進而確認「信任」與「顧客價值」如何影響服務滿意。

### 品質工具、觀念與制度對組織效能之影響研究： 產業構面個案研究

本研究透過產業構面問卷調查與訪談，以分析品質工具、品質觀念及品質制度三個面向對增強組織效能的可能效果；以分析品質管理技術對組織效能的影響。

### 品質工具、觀念與制度對組織效能之影響研究： 廠商構面個案研究

本研究透過產業調查與廠商組織個案研究，分析品質工具、品質觀念及品質制度三個面向對增強組織效能的可能效果；以分析品質管理技術對組織效能的影響。

### 隨機邊界模型的統計檢定與模型認定問題探討

本研究將針對隨機邊界模型中的統計檢定與模型認定等問題進行研究，期能增進 SF 模型設定之檢定方法，並提出 SF 模型具有選擇樣本性質時的估計方法。

### 考慮環境外部性之效率與生產力評估指標： 生產前緣函數為基礎之量化模型與政策分析

本研究擬新提可容納非意欲產出之差額模型，建立可同時評估生產與環境品質績效的整合衡量指標，進而建立以差額模型為計算基礎的新生產力指數。

### 在考慮非意欲產出下的焚化爐效率與超額運量 分析

本研究將擴充傳統方向距離函數的概念，改良評估焚化爐效率之工具；並透過推估污染物的影子價格，模擬不同環境標準的影響，進而焚化爐的可能超額運量問題。

### 計畫執行近況

十月廿七日，本計畫舉行本計畫執行規劃討論會。會中作成下列決議：一、儘速成立專屬網站；二、每年至少發表一篇論文；三、將建立 working papers series 資料庫；四、每個月定期舉行研究討論會；五、各分項計畫不定期舉行演講會；六、各分項計畫當年度之績效表現，將作為下年度經費分配之重要依據；七、每年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評鑑；八、定期舉行成果發表會。

十一月十七日，本計畫舉行第一次研究討論會；十二月八日則舉行第二次研究討論會。二次討論會均由各分項計畫輪流進行報告，以促進各分項計畫間之認識與交流。



## 新近出版品介紹

###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本院出版之《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十二月發行第五卷第二期（總第 10 期）。本期學刊的專號主題為「東亞脈絡中的朱子學與陽明學」，劉述先的特稿〈朱子在宋明儒學的地位重探〉，概述了朱熹如何建構儒家的「道統」概念，王守仁、劉蕺山等如何繼承與修正朱子的道統觀，並討論現代新儒學如何對道統概念進行闡述與拓展。

三篇「專題論文」中，藤井倫明的〈「誠」在日本的變貌——由朱子之「誠」與山鹿素行之「誠」談起〉，比較朱熹及山鹿素行、伊藤仁齋等人所代表的日本古學派，兩者對「誠」觀有何異同，並試圖論證：朱熹的「誠」觀以「理」觀為核心，而山鹿素行的「誠」觀則是以「人情」為核心。

張崑將的〈近代中日陽明學的發展及其形象比較〉，回顧中日近代陽明學的發展關係，從陽明學如何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動力開始談起，進而析論近代中國陽明學如何透過梁啟超、孫文等留日人士的引介而發展。

王晴佳的 "Itō Jinsai and the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The Ancient Meaning School and the Rise of Restorationism"，以伊藤仁齋的《論孟字義》與陳淳的《性理字義》之關係為中心，討論東亞儒學在十七、十

八世紀的跨文化發展。這一發展以復古主義為特徵，希圖繞開程朱理學的傳統，回歸原典，直接研究古代儒學典籍；並試圖論證：其實相似的復古主義，在明代中國和朝鮮王國已見端倪，可見古義學派與明儒學之間的聯繫；然而，儘管仁齋思想早於清代考證學，但卻無直接影響。

除此之外，本期學刊編有四篇「研究討論」：中純夫的〈朝鮮陽明学の特質について〉，概述了朝鮮陽明學中的江華學派與霞谷學派的特色與異同。

阮金山的〈當代越南儒教研究之現狀與問題〉，縱論了自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六的這廿年間，越南儒學的發展歷程、現狀與當前問題。

金培懿的〈「義理人情」的詩教觀——江戶古學派的《詩序》觀研究〉，針對以伊藤仁齋、伊藤東涯、荻生徂徠、太宰春臺等人為代表的江戶古學派，如何回應朱熹的《詩序》，並說明古學派《詩經》觀中的「義理人情」理想，與日本佛教的「慈悲心」有相互呼應之處。

曾德明的〈漢藏命理學初探——以《如意寶樹》為中心〉，根據西藏佛教格魯派格西的著作，探討西藏佛教如何與將西藏本土的民間信仰，結合源自中國的「五行」理論；並介紹

「漢藏命理學」的基本原理與內容。

##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本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所出版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書系，本季出版了五冊新書：編號 75，潘朝陽著的《臺灣儒學：傳統與現代》，探討臺灣儒學的兩種雙重性：其一，臺灣儒學在面對中華文化儒學的傳統時，始終帶有海外離島的邊緣性，但另一方面卻又呈現了逃離暴政、異族統治的遺民儒學特性；其二，臺灣儒學不僅吸納了中華儒家傳統的價值系統，也正面回應現代化的多元文化價值的影響。

編號 76，鍾雲鶯著的《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透過分析清末民初民間儒教的著作，探討民間儒教對儒家思想的解讀，及其對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以發掘儒家思想如何被民間讀書人以宗教修行觀，融入庶民生活的宗教實踐中；進而發展出明清以來民間三教融合的特殊現象。

編號 77，林維杰著的《朱熹與經典詮釋》，從詮釋學的角度分析朱熹的經典詮釋觀點，分別從意義論、方法論、工夫論與轉向論等四個部分的討論展示一套「朱熹的詮釋學」；為國內首次以詮釋學的角度完整處理朱熹解經思想的專書。

編號 78，徐興慶著的《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聚焦在朱舜水思想體系的整合研究，從其「經世致用」的理論主張、對佛教思想的批判作深入的探討；同時探究朱舜水的儒教傳播，如何影響德川前期水戶學的尊王關係，及後期水戶學的攘夷、倒幕及其與明治維新。

編號 79，徐興慶編的《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收錄十九篇關於「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主題的論文。這兩個互相關涉

的研究領域，在漢語學術界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可謂在「國族史」與「全球史」兩大研究動向之間，開創「區域史」研究的新視野。

## 《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

本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所出版的《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書系，本季出版了一冊新書：編號 7，古偉瀛編的《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特將〔清〕總理衙門館藏《教務教案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有關臺灣的史料摘出重新打字，並收編了臺灣第一位本地出生神父涂敏正（1905-1980）的《涂神父日記》、日治時代在石碇出版的教會書籍《迷信歌》、日本神父早阪奈善郎陪伴教廷特使 Giani 來台視察的遊記〈臺灣拾掇——伴隨使節記行〉與〈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若干臺灣教會組織向日本殖民當局申請成立法人被拒，及乙未割台時雲嘉地區教堂被毀及教友損失的索賠要求的珍貴史料，以便利臺灣近代天主教史之研究。

## 《東亞法治與人權叢書》

本院「東亞法治之形成——對東亞法治理論、體制與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計畫」所出版的《東亞法治與人權叢書》書系，本季出版了一冊新書：編號 4，林鈺雄、顏厥安合編的《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歐洲人權裁判研究（二）》，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基礎，針對羈押被告人權之保障、轉型正義、子女親權與會面交往權之酌定、性言論的管制等議題，分析國際人權之基準要求；此外，更探討了歐洲人權法院自身的改革、跨國憲政的發展、歐洲人權法院與奧地利內國法之互動等主題，期能有助於讀者了解歐洲人權法院如何在不同法系間，發展其人權基準。希望通過研究歐洲人權保障機制及國際人權基準的發展，提供我國未來法治發展之借鏡。

## 【院務新訊】

# 院務短波

### 出訪歐洲

本院於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由院長黃俊傑教授率團出訪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與德國柏林學術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商討日後進行學術合作事宜；黃俊傑教授並應倫敦政經學院亞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Centre）邀請，以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為題發表演說。

### 九十七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院於十一月廿五日，假本校農化新館五樓第四會議室舉行「九十七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就本院及所屬各研究計畫本年度之研究成果，進行報告。

本次成果發表會，係響應本校研究發展處「慶祝八十週年校慶活動」而舉辦；其目的除增進各界對本院研究近況及研究成果之認識外，更希望能提昇本院所屬六大整合型研究計畫團隊之間的橫向交流。

### 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

本院於十一月廿八日，與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合作，假本校農化新館五樓第四會議

室，以「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為主題，舉行「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

會中邀請美國杜克大學佛蘭克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Srinivas Aravamudan 教授，與明尼蘇達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Ann Waltner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本次會議共邀請王文顏教授、王汎森院士、甘懷真教授、張維安教授、彭森明教授、黃俊傑教授等多位國內人文學領域學者，共同就「人文學研究成果的評鑑問題」、「人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發展策略」、「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等議題進行座談。

### 與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締結姊妹院

本院於十二月十日，假本院會議室，與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代表團，舉行兩院簽署《學術交流及合作研究協議》儀式，兩院自此正式結成姊妹研究單位。

兩院約定將共同就「經典詮釋」、「東亞儒學」等學術領域，進行交流和合作；未來，兩院將合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相互派遣學者進行訪問交流，並共享學術研究文獻。

### 「全球化時代東亞研究的新取向」國際研討會

本院於十二月十三至十四日（六、日），假本校農化新館五樓第四會議室，舉行「全球化時代東亞研究的新取向」國際研討會，邀請

國內外學者探討：為因應最近數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解釋的轉向」與「研究典範的轉移」，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東亞研究」應有何新取向與新議題。

會中邀請德國埃森人文高等研究院 Jörn Rüsen 教授，與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由中央研究院許倬雲院士進行總結講演。

本次會議共邀請 Anne Waltner 教授、Alain-Marc Rieu 教授、張廣達院士、胡佛院士、林南院士、朱雲漢教授、石之瑜教授、汪榮祖教授、林滿紅教授、黃光國教授、黃俊傑教授、葉俊榮教授、鄭伯璜教授、鄧正來教授等多位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共同發表論文並參與座談。

### 修訂《延聘訪問學者作業要點》

本院修訂之《延聘訪問學者作業要點》已於九月卅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茲概述要點內容如下：

一、除本院主動延聘者外，本院所屬研究計畫總主持人每年得向本院推薦一名適當人選（以有專書寫作計畫者為優先），來院擔任研究講座或客座研究人員，並進行短期（一至六個月）訪問研究；

二、獲聘來訪之國外學者，本院補助演講費或日支生活費；

三、獲聘來訪學者，得由本院或相關院所提供研究室、電腦等基本設備，並可使用本校圖書館之相關資源；

四、獲聘來訪學者應於本院進行至少一場演講或學術座談，並應於訪問結束後投稿論文一篇至《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或完成專書，由本院優先出版；

五、獲聘來訪學者於訪問期間之研究成果

（包括論文、專書和研究報告等），應於公開發表時註明「於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之研究成果」或類似文字；

六、獲聘來訪學者，可自籌研究經費，或由本院每月補助研究工作費最高一萬元；本院並支應研究所需業務費（須檢據報銷）每月最高二萬元；

七、獲聘來訪學者因特殊事故（如出國開會、考察或為執行研究計畫及蒐集資料等）需暫時離臺者，應經本院同意；其每年出國日數以累計不超過三星期（含例假日）為限，聘期不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超過三星期之離臺天數，應核實扣發其工作酬金。

## 院內大事紀

2008 年 9 月 16 日~2008 年 12 月 15 日

日期	紀要
10 月 08 日	儒學討論會 楊儒賓教授主講：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怎麼顯現的？」
10 月 13 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張廣達院士主講： 「近百餘年來的英法漢學——兼述評近年 François Julien 和 Jean-François Billeter 的熱烈爭執」
10 月 15 日	儒學討論會 林宏星教授主講：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荀子『心與道』的關係片論」
10 月 16 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James Wilkinson 主講： "Teaching Excellence: As a Key to the Liberal Arts"
10 月 30 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陶德民教授主講： 「關於昭和初期『近代超克論』的一個考察——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
11 月 01 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山室信一教授主講： 「台灣と日本の海洋性をめぐる空間心性と地勢的意義」
11 月 05 日~ 11 月 12 日	派團出訪英國牛津大學、倫敦政經學院與德國柏林學術研究院

日期	紀要
11月17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朱雲漢教授主講： 「亞洲民主發展的反思」</p>
11月17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教授主講： 「文學對談：從事文學翻譯的心路歷程」</p>
11月22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張廣達教授主講： 「中亞大乘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p>
11月25日	<p>九十七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p>
11月26日	<p>儒學討論會 陳少明教授主講： 「論語外傳——對孔門師弟傳說的思想史考察」</p>
11月26日	<p>儒學討論會 陳來教授主講： 「郭店竹簡《五行》篇與子思思想研究」</p>
11月28日	<p>第十二屆人文聯盟座談會：人文學術與高等教育</p>
12月01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蔡明誠教授主講： 「東亞法治之法學研究議題及方法——以『人法』與權利歸屬論為例」</p>
12月09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池田証壽教授主講： 「字書記述と実用例との連関から見た漢字字体の日本的標準の成立」</p>
12月09日	<p>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佐久間正教授主講： 「日本文学と環境思想——金子みすゞの詩を中心に」</p>

日期	紀要
12月10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佐久間正教授主講： 「琉球王国と儒教——蔡温を中心に」
12月11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池田証寿教授主講： 「《徒然草》第八十二段に見る日本人の美意識」
12月11日	與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簽署學術交流及合作研究協議
12月12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高坂史朗教授主講： 「比較という視座」
12月15日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陳鼓應教授主講： 「莊子的人文精神與生命關懷」